

敗軍之將劉平(973-1040後)——兼論宋代的儒將

何冠環

香港理工大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導言

宋仁宗(1022-1062在位)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主元昊(1032-1048在位)率兵侵犯宋西邊重鎮延州。兩員出身將家子的宋將劉平、石元孫(?-1046後)領兵萬人往援，卻因輕敵而於延州外之三川口中伏，全軍覆沒，二人被執。宋廷震驚兵敗之餘，又為監軍中使黃德和(?-1040)指控劉平降敵一事而引來一番風波。宋廷眾多文臣對宦官監軍一向不以為然，對於黃德和之指控，他們都不相信。經過一番調查，劉平被「證實」力戰被俘，並「罵賊而死」。為了表揚劉平二將之忠勇，宋廷給予二人極高之恤典；至於覆師之責任，就由誣人降敵之黃德和作為代罪羊。可惜劉、石二人事實上並沒有如宋廷公開表揚的那樣轟轟烈烈地戰死，他們都苟活下來。在宋廷大失面子下，劉平最後只能默默無聞地客死蕃域，不得還鄉；而石元孫雖在數年後獲釋歸宋，但不被宋廷所諒，最後落得被拘管終身的下場。

劉平、石元孫這兩員敗軍之將，讀宋史的人一般都不會留下甚麼印象；不過，假若細心鉤尋二人的家世事跡，卻會發現他們並非泛泛之輩。論起官位，劉平官至節度觀察留後，石元孫官至觀察使，在武官中地位殊不低。就兵職而論，劉平是鄜延、環慶兩路副都部署兼管勾涇原路兵馬，石元孫是鄜延路副都部署，二人分別是一路至三路的最高級武官；而就軍職而言，劉平帶步軍副都指揮使，石元孫帶殿前都虞候，在當時三衙管軍中，他們分別名列第三和第四的高位。至於家世，石元孫出身名門，祖石守信(928-984)是太祖(960-976在位)從龍大功臣，父石保興(947-1004)是太宗(976-997在位)、真宗(997-1022在位)朝守邊名將。劉平家世雖不及石元孫，但乃父劉漢凝(?-1016後)在真宗朝亦是一員能征慣戰的中級武官。

本文暫只專論劉平，除為了篇幅關係外，亦由於劉平比石元孫更有一番與眾不同的經歷，值得研究宋史的人注意。劉平雖是將家子，但他並不由戎行出身，而由科舉仕進。當他出任文官多年後，卻以武幹將略為君相所識，結果從文資轉為武資，最後更史

無前例地陞任為「禮繼二府」的三衙管軍。¹他覆師之前，在宋人眼中，他才兼文武，仁宗且譽之為「詩書之將」；即在他兵敗之後，名臣宋祁(998-1061)仍稱他為近世不可多得的「儒將」。²本文的研究重點，不在於討論劉平如何及為何在三川口覆師，而是以他的仕宦經歷，作為個案，探討在宋代以文馭武(不是重文輕武)的國策下，儒臣如何成為將帥，另評估儒將在統兵抵禦外敵的得失果效。

一、從將家子到士大夫：劉平的文官仕途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據《隆平集》及《東都事略》本傳所載，他在康定元年戰敗時年六十八，則他當生於太祖開寶六年(973)。其父劉漢凝出身行伍，曾從太宗征北漢，以攻取岢嵐、憲州有功。真宗繼位後，他奉命鎮守北邊。咸平六年(1003)六月真宗親自點將，防禦遼軍入寇；劉漢凝榜上有名，奉命在東路率兵五千，夾擊遼軍。景德元年(1004)四月，又以北邊諸路巡檢的身分，奉命率兵會同大將荆嗣(?-1014)在莫州、順安軍一帶禦敵。宋遼議和後，他才調返內地。大中祥符三年(1010)他以東染院使出為淮南西路兵馬都監，最後官至崇儀使。³身為將家子，劉平據稱善弓馬，而且又「剛直任俠」；不過，劉平並沒有像一般武臣子弟，憑父祖恩蔭入仕，自低級武官做起。劉漢凝效法許多有遠見的武臣，讓他們的子弟在習武之餘，更發憤讀書，尋求從科舉之途入仕。劉平大概將父蔭的名額讓給弟弟劉兼濟(?-1052後)，自己寧可走艱難百倍的科舉路。結果他應舉成功，並且進士及第，登上入仕的坦途，比起靠恩蔭出身的官員子弟，自然風光得多。⁴

¹ 關於三衙管軍的地位，宋神宗(1068-1085在位)在熙寧九年(1076)四月曾批示說：「殿前、馬、步軍三帥，朝廷待遇，禮繼二府，事體至重。」參見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1992年)，卷二百七十四，頁6701。

² 《長編》，卷一百一十五，頁2692；宋祁：《景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十〈回劉皇城書〉，頁12-13。關於儒將的定義與討論，可參見本文第二節。

³ 脫脫(1314-135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卷三百二十五〈劉平傳〉，頁10499；《長編》，卷五十四，頁1196；卷五十六，頁1233；徐松(1781-1848)：《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國立北平圖書館1926年本)，〈職官四一之八四〉；王稱(?-1200後)：《東都事略》，收入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一百一十〈劉平傳〉，頁1683-84；曾鞏(1019-1083)：《隆平集》，收入趙鐵寒：《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卷十四〈劉平傳、石元孫傳〉，頁720-24。

⁴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劉兼濟傳〉，頁10499，10504。劉兼濟字寶臣，以父蔭授三班奉職。他和乃兄一樣，善騎射而讀書知兵旨。劉兼濟的事跡在本文第三節再詳述。又考宋初武

[下轉頁105]

劉平在景德二年(1005)三月登進士第，這一榜的權知貢舉是翰林學士趙安仁(958-1018)，同知貢舉有翰林學士晁迥(951-1034)、龍圖閣待制戚綸(954-1021)、直昭文館陳充(944-1013)和直史館朱巽(?-1020後)等四人。是榜取進士二百四十七人，分為五等；第一至三等賜及第，第四、五等同出身。狀元是濮州鄆城人李迪(971-1047)，榜眼是李迪好友夏侯麟(?-1005後)，而第三人則是臨江新喻人李諮(982-1036)。這一榜進士姓名可考的有卅餘人，包括司馬光(1019-1086)之父司馬池(979-1041)、妻父張存(984-1071)、文彥博(1006-1097)妻父、以知兵稱的陳貫(968-1039)、編纂《道藏》之張君平(?-1016後)、有直臣之名的劉隨(971-1035)與章頰(?-1033)、有循吏之名的張保雍(975-1033)、以善醫聞名的郎簡(968-1056)等人，算得上是人才濟濟。除了劉平外，將家子李渭(979-1041)也應舉登第。他後來也和劉平一樣，自文官轉為武職。⁵

[上接頁104]

臣子弟循科舉出身，例子不少，好幾個數代為將的名藩、禁軍大將或曾任樞府執政的武臣如侯益(886-965)、楊廷璋(912-971)、向拱(912-986)、趙晁(909-960)、王彥超(914-986)、鄭彥華(?-960後)、楚昭輔(914-982)、陳思讓(903-974)、張遜(940-995)、楊守一(925-988)便有子弟兒孫進士及第，從文官之途入仕。而官位稍次的一批武將如張藏英(?-962)、趙延進(927-999)、劉審瓊(?-997)、裴濟(?-1003)、程德玄(940-1004後)、楊允恭(944-999)、袁繼忠(938-992)等之子弟兒孫亦有登第的，計有趙延進之子趙昂(?-977後)在太平興國二年登第，張藏英之孫張鑑(947-1004)在太平興國三年(978)登第，陳思讓孫陳若拙(955-1018)在太平興國五年登高第(榜眼)、鄭彥華子鄭文寶(953-1013)在太平興國八年(983)登第，袁繼忠子袁用成(?-985後)在雍熙二年(985)登第，王彥超之孫王克從(?-998後)和楊允恭子楊可在咸平元年(998)登第，侯益之孫侯延之(?-999後)在咸平二年(999)登第，程德玄兄子程賁(?-1012後)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登第，向拱之子向昱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第，張遜孫張先(?-1039；按此張先非詞人張先)在天聖二年(1026)登第，趙晁曾孫趙咸熙(?-1030後)在天聖八年(1030)登第。至於楊廷璋二子楊坦、楊埴、劉審瓊之孫劉爽、裴濟之兄弟裴麗澤、裴麗正、楚昭輔姪孫楚隨、楚咸、楊守一孫楊夢得則登第年分不詳。見《宋史》，卷二百五十四〈侯仁矩傳〉，頁8883；〈趙延溥傳〉，頁8899；卷二百五十五〈楊廷璋傳〉，頁8905；〈向拱傳〉，頁8910；〈王彥超傳〉，頁8913；卷二百五十七〈楚昭輔傳〉，頁8960；卷二百五十九〈袁繼忠傳〉，頁9006；卷二百六十一〈陳若拙傳〉，頁9040-41；卷二百六十八〈楊守一傳〉，頁9224；卷二百七十一〈張藏英傳〉，頁9291；〈趙延進傳〉，頁9300；卷二百七十四〈劉審瓊傳〉，頁9365；卷二百七十七〈張鑑傳〉，頁9415；〈鄭文寶傳〉，頁9425；卷三百八〈裴濟傳〉，頁10144；卷三百九〈程德玄傳〉，頁10156；〈楊允恭傳〉，頁10163；吳熊和、沈松勤(校注)：《張先集編年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附錄〉，頁314。

⁵ 曾鞏《隆平集·劉平傳》記劉平於景德三年登進士第，考景德二年六月詔停貢舉兩年，是故景德三年及四年均無取士。曾書所記三年，當是二年之筆誤。這一榜第一等的頭三人中，李

[下轉頁106]

〔上接頁105〕

迪在真宗晚年拜相，李諮亦於仁宗朝官至知樞密院事；然夏侯麟及第後之仕宦不詳，相信並未貴顯。據龔鼎臣(1010-1086)《東原錄》所載，夏侯麟與李迪在登第前一年，同在濮州王驥之屋壁題詩。疑夏侯麟亦是濮州人。司馬池甚有時望，官至侍御史知雜，他的同年兼姻家張存是冀州人，官至禮部尚書。張存和劉平一樣好言兵事，並受知於寇準(962-1023)。陳貫字仲通，祖籍相州安陽，後徙河陽，他以通孫吳兵法，而好談邊事著稱。他在咸平年間多次上奏言事，遂列名第二等，後官至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他與李迪是布衣之交，後娶李迪妹。他又是文彥博的岳父。張君房字允方，岳州安陸人，官至度支員外、集賢校理。劉隨字仲豫，徐州彭城人，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章頰字簡之，建州蒲城人，在天禧元年與劉平等擢監察御史，他敢於治獄及言事，曾請捕繫涉嫌疑受賂的外戚皇城使劉美(962-1021)而被貶。仁宗朝復入為度支判官，明道二年(1033)出使遼國，卒於遼。張保雍字粹之，蔡州汝南人，中甲科，先後受知於寇準和李迪，官至刑部郎中、兩浙轉運使。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官至工部侍郎，他以善醫著稱，壽至八十九，有集驗方數十行世。他的兒子郎景微(?-1038後)是司馬光同年進士。李渭是河陽人，字師望，從祖、祖父都是武將，父始為文臣。他中舉後屢任地方，官至太常博士，後以治河之策，在仁宗初年得到參知政事魯宗道(966-1029)的賞識和推薦，換武資為北作坊副使充修河都監。後得同年、樞密直學士李諮的舉薦，加惠州刺史出為益州鈐轄，後官至四方館使、鄜延路兵馬鈐轄，前後在西邊十餘年。這一榜登進士第可考的人還有太祖朝宰相王溥(922-982)幼子王貽矩(?-1005後)、宋初名臣劉載(913-983)之子劉宗望(?-1005後)、寇準姪婿高清(?-1005後)、太宗朝宰相、後貶死崖州的盧多遜(934-985)幼子盧察(985-1039；官至司門員外郎)、杭州餘杭人元奉宗(961-1038；字知禮，中甲科，官至都官員外郎)、河陽人張弇(979-1040；字漢臣，官至兵部郎中)、杭州人鮑當(?-1038)、融州人覃慶元、成都人張及(字子元，官至淮南轉運使)、淳安人吳漣(官大理評事)、嚴州人徐舜俞(?-1036後)、建州建陽人江任、建州浦城人黃覺(字民先，官至殿中丞)、福州莆田人翁緯(一作福州福清人，祖為翁承贊，官新會令)、福州侯官人張翼、興化軍仙遊人葉賓(967-1045；字虞卿，官至都官員外郎)、湖州人周畋、潮州人林從周(975-1025；官至提點浙江東西刑獄公事、度支員外郎)、太原人宋武(970-1025；字仲達)、里籍不詳的郭昭著(字汝晦，官至兵部郎中)、劉滋(?-1005後)及白穰(?-1005後)；另外，幽州人、虞部員外郎知鄭州王矩(?-1005後)亦特賜進士及第。此外，司馬光好友、常州武進人錢公輔(1020-1071)之父，亦在是榜登第。除了正榜進士二百四十七人外，這一榜又取特奏名五舉以上江白等一百一十一人，諸科五百七十人、特奏名諸科七十五人。另外，於是年五月，真宗又特試河北貢舉人，得范昭(?-1005後)、馬至(?-1005後)以下進士及第五十一人，進士出身四十五人；同時，又賜諸科及第、出身六百九十八人，另特奏名進士及諸科賜及第與出身六百六十二人，當中姓名可考有李正辭(?-1005後)一人。另外真宗又特賜兩名神童科名，其中晏殊(993-1055)獲賜進士出身，姜蓋(?-1005後)賜同學究出身。這一年共取士二千四百六十人。參見《隆平集》，卷十四〈司馬池傳〉，頁537-40；卷十九〈劉平傳〉，頁720-21；李埴(1161-1238)：《皇宋十朝綱要》，收入趙鐵寒：《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卷三，頁89；曾鞏：《元豐類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四十七〈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頁9-12；龔鼎臣：《東原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9；《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之七〉、〈選舉二之五、三、六、五〉；《長編》，卷五十九，

〔下轉頁107〕

劉平登第時年已三十三，算不上是少年得志，他大概名列在第三等，故只除授縣尉之職。他第一分差事是常州無錫尉，據秦觀(1049-1100)及王銍(?-1144後)的著作所載，當時無錫境內有起自浙西、轉擾諸郡的巨盜劉鐵槍未被捕獲。適逢元旦，劉平入謁縣令。這個出身齊魯經生的無錫縣令，既老且昏，偏又大刺刺的坐在官廳接見僚屬，對劉平擺起上司架子。「素尚氣」的劉平受不了這口氣，竟然衝上官廳揮拳痛毆縣令，把他打倒於座下。縣令被左右救走後，劉平才從容離開官署，回家酣飲至醉，完全不將痛打縣令之事放在心上。當時一縣的人都傳言負責緝盜的縣尉劉平打死縣令，劉鐵槍一伙賊盜以為劉平自身難保，就放鬆戒備，趁著節日到無錫的草市飲酒。「似醉實醒」的劉平其實一直監視他們之動向，當他收到密報，曉得他們之行蹤後，就馬上出動弓手並聯同草市之人進行圍捕。羣盜大醉之下，不虞「大醉」的劉平說來就來，無力反抗下，劉鐵槍及其黨羽五人被劉平親手所殺，其餘廿多人全部被擒。劉平擒盜功成後返縣城，已

(上接頁106)

頁1311, 1321-23, 1328; 卷六十, 頁1340-41, 1344; 卷一百一十三, 頁2634, 2645; 卷一百一十九, 頁2812; 卷一百二十, 頁2830; 《宋史》, 卷二百四十九〈王溥傳〉, 頁8801; 卷二百六十二〈劉載傳〉, 頁9082; 卷二百七十七〈慎從吉傳〉, 頁9446; 卷二百八十七〈趙安仁傳〉, 頁9658; 卷二百九十九〈郎簡傳〉, 頁9926-27; 卷三百一〈章頴傳〉, 頁9992-93; 宋庠(996-1066): 《元憲集》(北京: 中華書局, 1985年據《叢書集成初編》本重印), 卷三十四〈彭城劉府君墓誌銘〉, 頁357-60; 范仲淹(989-1052): 《范文正公集》, 《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5年影印1936年本), 卷十二, 頁99; 蘇舜欽(1008-1048)(著)、傅平驥、胡問陶(校注): 《蘇舜欽集編年校注》(成都: 巴蜀書社, 1991年), 卷六, 頁394; 彭百川(?-1209後): 《太平治蹟統類》(揚州: 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影印《適園叢書》本, 1990年), 卷28, 頁477; 尹洙(1001-1046): 《河南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十四〈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頁3-4; 〈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陳公墓誌銘〉, 頁10-14; 卷十五〈惠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頁12-15; 卷十六〈兵部郎中知蕪州張公墓誌銘〉, 頁1-2; 〈司門員外郎盧公墓誌銘〉, 頁11-12; 司馬光: 《傳家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七〈錢君倚示詩有歸吳之興為詩三十二韻以贈〉, 頁13; 卷七十〈送郎景微序〉, 頁1-2; 卷七十六〈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頁14; 傅璇琮等(編): 《全宋詩》, 冊3(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1年), 卷一百二十七, 頁1486-90; 卷一百五十三, 頁1738, 1747; 楊時(1053-1135): 《龜山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三十五〈章端叔墓誌銘〉, 頁1; 余靖(1000-1064): 《武溪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十九〈宋故兩浙提點刑獄尚書度支員外郎林公墓碣銘〉, 頁9-12; 林慊(?-1596後): 《萬曆福州府志》(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0年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影印), 卷十六, 頁139; 陳頤(?-1475後): 《成化湖州府志》(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0年據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明成化十一年刊本弘治補刊本影印), 卷九, 頁8; 蔡襄(1012-1067)(著)、吳以寧(點校): 《蔡襄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卷三十八〈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葉府君墓誌銘〉, 頁699-701; 王銍(著)、朱杰人(點校): 《默記》(與《燕翼詒謀錄》合本)(北京: 中華書局, 1981年), 卷下, 頁52。

經甦醒過來的縣令也還公道，將劉平打上司及捕巨盜之功與過一併上奏，經本路轉運使之推薦，結果朝廷不追究他毆打上司之過，而以他捕盜有功，擢為大理評事，並調知開封府鄆陵縣。⁶ 任滿後再徙果州南充縣。大概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七月至三年初，因夷人侵犯瀘州清井監，劉平為轉運使任為權瀘州事。在權知瀘州任上，他率土丁三千人擊走夷人。大中祥符四年(1011)初，真宗祠汾陰，大小官員皆得陞官，劉平於是遷為大理寺丞。⁷

大概在大中祥符八年底或九年初，劉平以父喪解官。據載當他辭官出川，道出興州時，竟有賊徒不識好歹，攔途劫掠。賊盜掠得他的行李，打開一看，只有文書百餘帙和布數疋。賊首對其徒眾大嘆倒運，說劉是窮官一名，何足打劫。言猶未已，劉平已從後趕來，引弓射殺三人，嚇得其餘的賊人遁去。判永興軍寇準得知此事，即表奏劉平之功。在寇的推薦下，劉遷官為殿中丞知瀘州。⁸

劉平二度知瀘州，據稱夷人知道他的利害，懲前之敗，就不敢擾邊，而劉平就得以順利平安地的做完這一任差事。大概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底，他瀘州任滿代還，調往內地，擔任京西北路的潁州的通判。他從瀘州往潁州赴任，道過安州，遇故人留他作長夜之飲，他使命家屬先行。劉家在他未有同行之情況下，在路上遇盜，盜賊將他行囊

⁶ 據秦觀所記，劉平的幼子劉季孫(1033-1092)在元祐七年(1092)因會秦觀於京師，就將劉平幾件生平佚事告訴秦觀，其中劉平在安州的事，不載於國史以及劉平之行狀墓誌國史。參見秦觀：《淮海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十四〈錄壯愍劉公遺事〉，頁8-9；《默記》，卷中，頁22。

⁷ 《長編》，卷五十一，頁1120-21；卷五十九，頁1321-22；卷七十二，頁1623，1626，1645；《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499；《東都事略》，卷一百一十，頁1683-84。

⁸ 劉漢凝在何年病亡，史所未載；《隆平集·劉平傳》稱劉平「知果州南充縣，以父喪解官」，大概略去了他權瀘州一段經歷。據秦觀所記，劉平以父亡解官，道出興州境上遇賊殺賊，事為雍帥寇準表奏朝廷，而劉平得遷官。考寇準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自河南府徙判永興軍，則劉平遇盜應是在是年二月後，而劉漢凝病死，大概在大中祥符八年至九年。又關於劉平東歸遇盜之地點，秦觀及王稱均作興州，惟《隆平集》及《宋史》則作安州。考興州有二，一為宋境之興州，在利州路(四川北)；二為西夏之都城，即興慶府。《東都事略·劉平傳》所說的興州，當然是指川北的宋興州，而不是《宋史·劉平傳》所說的，後來劉平客死的西夏興州。設若劉平逕往開封，會同諸弟安葬乃父於故里，則他從瀘州北行，取道川北的興州，經長安、洛陽而至開封，雖則路途遙遠又難行，但方向與路線仍說得過去。考劉平後來再在安州遇賊，可能會牽及《宋史》編者將劉平在興州及安州遇賊二事，混而為一，而有此誤記。參見《隆平集》，卷十九，頁724；《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499；卷四百八十五〈夏國上〉，頁13994-95；《東都事略》，卷一百一十，頁1683-84；《長編》，卷八十一，頁1838-39，1855-56；卷八十二，頁1881-83；卷八十六，頁1971；卷八十九，頁2059；王存(1023-1101)(著)、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八〈利州路〉，頁360。《淮海集》，卷三十四，頁8。

的一銀釦劍和一鑲石腰帶劫走。他這次雖然沒法痛懲賊盜，但後來卻因禍得福。天禧元年(1017)二月，真宗下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不兼他職，專任言事及彈舉，並規定每月須一員奏事，倘有急務就許非時入對。就在是年五月，劉平中選，自殿中丞擢為監察御史，得以進入朝廷中供職。在御史任上，他克盡厥職，勇於言事，例如在是年七月，有見於諸路轉運使督促屬縣之令佐親自焚捕為害的蝗蟲，做得太過分，他即上言其事，請立罷之。另外，他又於天禧二年(1018)三月，為金明池開放士庶嬉游的問題而上言。這年九月，他請對於承明殿，也獲真宗允許，他的建言都得到真宗的採納。⁹ 真宗對劉平賞識有加，於御史之言職外，又委以其他重任。天禧三年(1019)五月，真宗改變御史不兼他職的做法，任劉平為三司鹽鐵判官，並賜他緋魚。¹⁰ 是年八月，真宗遣使安撫水災州軍，劉平又被選中出使河北路。九月，他再被選為賀遼國正旦使，出使遼邦。¹¹ 使還，於天禧四年(1020)初遷殿中侍御史。恰好當年在安州打劫他的一伙賊這時在黃州被擒，搜出的賊贓正好有劉平的銀釦劍與鑲石帶，照宋律，贓物歸原主，負責的官員審結此案後，上奏真宗。真宗對劉平的清廉甚為欣賞，說劉平為一郡之長，行李只有兩具不值錢的物品，實在難得。這時陝西轉運使一職出缺，當執政(可能是他的同年李迪)提名他出任時，真宗馬上批准。不過，他因與副使論事不合，徙知襄州。¹²

劉平在真宗晚年未能在仕途更上一層樓，是出於丁謂(966-1037)的排擠。天禧四年六月，賞識過劉平的寇準罷相。同年七月，寇的對頭丁謂及劉平的同年李迪雙雙拜相。可能出於李迪的推薦，真宗想重用劉平。丁謂沒有正面的反對，卻巧妙的說劉平是將家子，素來知兵，若差使他將兵西北，可以制敵。丁謂這番假擡舉，真排斥的話，結

⁹ 《東都事略》，卷一百一十，頁1684；《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499；《長編》，卷八十九，頁2056，2059；卷九十，頁2073-74；卷九十一，頁2103；卷九十二，頁2126；卷九十三，頁2147；《宋會要輯稿》，〈職官十七之三〉；《淮海集》，卷三十四，頁8。按：潁州為京東內地節度上州，瀘州為邊地上州，劉平自知瀘州而遷潁州通判，不算左遷。又他在安州遇盜之事，據秦觀所言，此事失記於國史與劉平之行狀及墓誌。與他同時被選為言官的劉燁(968-1029)，也是通判益州後代還，自著作郎擢為右正言的。另劉平被選為御史，我想和劉燁一樣，是當時尚在相位的王旦所薦，或至少是他同意的。

¹⁰ 《長編》，卷九十三，頁2147；卷九十四，頁2165；《宋史》，卷三百一〈章頰傳〉，頁9992-93；卷三百二十五，頁10499；《東都事略》，卷一百一十，頁1684。諫官御史中除了劉平兼任省職外，他的同年監察御史章頰亦兼任度支判官；右正言劉燁亦判戶部勾院。《宋史》及《東都事略》劉平本傳說他因言事太多而為丁謂所忌，《長編》已辨明其不確，我想忌劉平的，不是當時在外的丁謂，而是當時在相位、王旦的死敵王欽若(962-1025)。

¹¹ 《長編》，卷九十四，頁2165-66；《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八八〉。

¹² 《淮海集》，卷三十四，頁8-9；《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499；《東都事略》，卷一百一十，頁1684。

果打消了真宗召劉平回朝供職之念；而丁謂這番話，更對劉平後半生仕途有極深遠的影響。劉平後來痛恨丁謂，即種因於此。¹³

乾興元年(1022)二月，真宗病逝。仁宗繼位，以年幼由章獻劉太后(1022-1033攝政)垂簾聽政。丁謂威風了一陣子，把寇準、李迪及其親信趕盡斥絕；但好景不常，在是年三月，他即被寇準極賞識的參政王曾(978-1038)找到機會扳倒，受重譴遠貶崖州。丁謂垮了，劉平仕途的障礙因得以除掉。他先陞任侍御史，大概在天聖元年(1023)二月自襄州還朝復職為鹽鐵判官，擔任他的同年三司使李諮的副手。¹⁴ 是年六月，環慶路副都部署田敏(?-1023後)，坐與所管轄的屬羌往還時受賄，受到貶官罷任的處分。對於接任的人選，劉太后考慮了許久，不知是甚緣故，劉太后忽然想起當年丁謂對真宗誇許劉平可任邊將的話，結果就在是年八月，將劉平改任武職，自侍御史、鹽鐵判官改為尚衣庫使、環慶路鈐轄兼知邠州。劉平的十九年文官生涯，於是終結。轉任武官的劉平，這時早已年逾半百。¹⁵

二、儒將與管軍：劉平的武臣生涯

談到中國傳統上的儒將，我們可能馬上會想到三國時代的周瑜(175-210)和諸葛亮(181-234)。人們既讚嘆他們談吐風雅，又胸有韜略；不但能在廟堂上經邦論道，又能在沙場上統率雄師。然而，「儒將」的涵義是甚麼？卻一直沒有人深究。誠如已故的劉子健教授所言，儒將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為人慣用而未有嚴格定義的概念。劉氏在一篇專著中提出他的定義，認為儒將可以分為四種類型：(一)泛頌類、(二)軍師類、(三)準儒將類、(四)典型儒將類。第三及第四類型的涵義，最值得我們注意。按照劉氏的說法，準儒將類的人「確是文武全才，至少是由文轉武。雖然他們不一定以儒學為職業，

¹³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499-10500；《東都事略》，卷一百一十，頁1684；《長編》，卷九十五，頁2196-97；卷九十六，頁2206-7，2223-25；卷一百一，頁2330；卷一百六，頁2471。李迪深受真宗器重，他自太子賓客、參政拜相；但在是年十一月中了丁謂之圈套而被罷。

¹⁴ 《長編》，卷九十八，頁2271-76，2283-87；卷九十九，頁2291-94，2300；卷一百，頁2314-16；卷一百一，頁2330；《宋史》，卷二百九十二〈李諮傳〉，頁9753；卷三百二十五，頁10499。劉平陞任侍御史，相信在丁謂垮臺後；考寇準女婿王曙(963-1034)在天聖元年二月自貶所復起為光祿卿知襄州，則劉平當在是年二月前離襄州。又考劉平在是年八月以鹽鐵判官、侍御史改武職，則他自襄州代還後便返京供職。他復任鹽鐵判官，相信是李諮的推薦。按乾興元年十一月三司使李仕衡(959-1032)以足疾自請解職獲准，李諮即由權知開封府擢權三司使。又考天聖元年正月底鹽鐵判官張傳(?-1023後)受命安撫京東、淮南諸州，不知劉平是否就是這時回朝接張傳之職。

¹⁵ 《長編》，卷一百，頁2324；卷一百一，頁2330；《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499-10500；卷三百二十六〈田敏傳〉，頁10534。

但是兼通儒術，並且能應用他們的才識，統帥軍隊」。至於典型的儒將，以「嚴格標準而言，狹義的儒將是指以儒學為職業，以士大夫的身份，親自帶領軍隊從事戰役的」。劉氏並認為，「從這狹義的類別來看，典型的儒將到宋代才多起來」。¹⁶ 劉氏對儒將下的定義是否準確？他所評定的宋代儒將人選是否恰當(尤其是宋初)，都是見仁見智的問題。關於儒將的定義、涵義等問題，本文不擬提出甚麼新說。對於儒將，本文願採用較寬的涵義：即凡符合劉氏第三及第四類型條件的人，均以儒將稱之。

根據上面的標準，劉平完全符合儒將之資格。他曾被仁宗譽為「詩書之將」，又給宋祁視為近世少有的「儒將」。¹⁷ 在這方面，劉平擁有進士及第的資格，又擔任文官近廿年。雖然他不像被宋人公認為儒將的柳開(947-1000)、寇準及張詠(946-1015)等有詩文集傳世，¹⁸ 但他的儒臣身分卻無可懷疑；至於「將」方面，劉平是貨真價實的正任武資官，而當他陸任三衙管軍時，就比任何人更符合宋人所稱的「將」的身分(按：宋代最狹義的「將」，專指三衙管軍，與「相」並稱)。雖然劉平最後是敗軍之將，但若不以成敗論英雄，則他被稱為儒將，是合宜的。

¹⁶ 參見劉子健：〈從儒將的概念說到歷史上對張浚的評論〉，載陶晉生師(主編)：《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7-88年)，頁481-83。依劉氏的定義，諸葛亮只算是準儒將，而他稍後的杜預(222-284)才算典型儒將。至於周瑜不算典型的儒將，劉氏並沒有討論。

¹⁷ 參見注2。

¹⁸ 柳開字仲塗，大名府人。《宋史》將他列入〈文苑傳〉。其父柳承翰(?-963後)在乾德初仕至監察御史。他於開寶六年(973)登第，平生提倡韓柳文，是宋初的古文家及經學家。他雖出身儒門，但自幼有膽勇，會擊劍，尤其善射，絕非文弱書生。他又好談兵事，多次請求在邊庭效命。太宗在雍熙四年五月，應他的要求，將他自殿中侍御史改為崇儀使，由文官轉為武官。他在太宗朝歷知寧邊軍、全州、桂州、滁州、環州、邠州、曹州、邢州。真宗即位後，遷如京使，出知代州。他曾上書請真宗親征，並表示願為前驅。後再知忻州及滄州，咸平三年卒，有《河東先生集》傳世。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父寇湘是後晉時之狀元。他在太平興國五年(980)登進士第。他才兼文武，既長於詩文，又諳韜略。他的詩詞帶有幽婉之意；其實他性情剛猛高傲，而且喜歡射箭騎馬，並嗜酒好博，甚有武人的脾氣。太宗早就賞識他，他在太宗朝從樞密直學士做到樞密副使，執掌兵符，太宗晚年，再晉位參政。真宗景德元年，在遼軍將大舉入侵前，他臨危受命拜相。澶州之役，宋廷靠他主持大局，統率大軍，才能有驚無險地達成澶淵之盟。他的儒將風範一直深受宋人景仰，有《寇忠愍公詩集》傳世。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是寇準的同年至交，少任俠，精於擊劍。他登第後以治郡之才受太宗賞識，擢樞密直學士。太宗晚年四川發生李順(?-1017)之亂，他被任為知益州，收拾殘局。張詠上馬管軍，下馬治民，恩威並用，四川得以轉危為安，宋人因譽他為治蜀能臣之首。他在真宗朝屢任要職，屢當方面之任。真宗嘗稱其材任將帥，只是以疾不盡其用。他詩文亦甚出眾，有《乖崖集》傳世。參見《長編》，卷二十八，頁637；《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準傳〉，頁9527-34；卷二百九十三〈張詠傳〉，頁9800-9804；卷四百四十〈柳開傳〉，頁13023-28。

劉子健教授筆下的第一代北宋儒將，是與劉平同時的韓琦(1008-1075)、范仲淹、文彥博等人。¹⁹ 然而，倘我們細心考究，準儒將或典型儒將，其實早在宋初已大量出現。除了前述的柳開、寇準、張詠外，宋初名臣如張齊賢(943-1014)、錢若水(960-1003)，以至辛仲甫(921-1000)、趙昌言(945-1009)、向敏中(948-1019)等，皆可稱得上儒將。²⁰ 當然，儒將可以是保留文階的士大夫，而轉為武資的文臣，也不是所有人都稱得上是儒將。不過，宋代科舉出身而具有武幹，然後轉為武資的儒臣，則是最受人認同為儒將的。

¹⁹ 劉子健：〈從儒將的概念說到歷史上對張浚的評論〉，頁484-85。

²⁰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太平興國二年進士。他議論慷慨，有大略，懂兵事，既在樞密院執掌兵符，又統兵出鎮邊庭。他在雍熙三年出守代州，並出奇兵大破遼軍於土磴寨。他在太宗晚年及真宗初年兩度拜相，罷相後真宗仍倚重他鎮守方面。他出將入相，在太宗一朝的宰臣中，以他最具將才。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父錢文敏官至司封員外郎。錢若水於雍熙二年登進士第，因寇準之薦連擢為知制誥、翰林學士。他有武幹，通曉兵機，太宗晚年，擢他為同知樞密院事。真宗繼位後，有戰守兵機之事，均詢問他的意見。咸平五年，他率兵往綏州，過黃河時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為戎人所服；真宗即稱許他是儒臣中知兵的。真宗又命他巡撫陝西沿邊諸州。使還，又將他改秩為鄧州觀察使，從文資改為武資。他是真宗早年最信任的軍事顧問，他在咸平六年九月卒。他倘非早死，也許在澶淵之盟主持大局的是他，而不是寇準。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祖、父均任地方小官。他少好學，能吏事，容貌英偉，而以善射著稱。後來擔任州郡幕職，都很有政績。太祖問羣臣中文武兼資者有何人，宰相趙普(922-992)即舉薦他，太祖改任他為益州兵馬都監。他在太宗初年曾使遼，不辱命而返，後歷任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參政。咸平三年卒。辛仲甫雖然沒有帶過兵出征，但他文武兼資的條件，出守方面之事功，也教他像張詠一樣，可入於儒將之列。趙昌言字仲謨，也是汾州孝義人，其父為太宗晉邸舊僚，曾任縣令及州郡幕職。他是太平興國三年榜的省元兼進士第三人。他也一樣文武兼資，既任過知制誥，預修過《文苑英華》，當過同知貢舉，又出守過邊庭重鎮，並一度擔任平蜀部隊之都部署。他受太宗賞識，先後出任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真宗繼位後，他除出任過御史中丞外，長期出任方面，防禦北邊。趙昌言雖是進士出身之文臣，但他性好強，尚氣概，所至以威斷立名，性情與張齊賢、寇準等相近。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其父仕至縣令。他是寇準、張詠的同年進士。他也是文武兼資的人，而長相和張齊賢等一樣，也是姿表健碩。他在太宗晚年，受太宗賞識，擢為同知樞密院事。他明辨有才略，遇事敏捷，對西北二邊的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他在樞院執掌兵符，大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之氣概。真宗繼位後，他調陞參政，但真宗卻破例地要他繼續參預樞院之事務。他在真宗朝，兩度拜相，而在罷相期間，一直出任方面，尤其扼守西邊，防範西夏，做得甚為稱職，一度出任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充當一路帥臣。他的將才並不比他的同年寇準、張詠遜色。參見《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張齊賢傳〉，頁9150-58；卷二百六十六〈錢若水傳〉，頁9165-71；〈辛仲甫傳〉，頁9178-80；卷二百六十七〈趙昌言傳〉，頁9194-98；卷二百八十二〈向敏中傳〉，頁9553-57；《長編》，卷四十五，頁972-74；卷四十六，頁999-1001；卷五十一，頁1123-24；卷五十四，頁1191；卷五十五，頁1215；文瑩(?-1078後)：《玉壺清話》(楊立揚點校，與《湘山野錄》合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一，頁10。

宋代文臣願意轉資為武臣，一方面是受傳統的儒將觀念影響，不以為轉為武臣，會低人一等；另一方面，是太祖、太宗兄弟大力鼓勵推動所致。宋初推行以文馭武的政策，一方面優待文臣，讓他們操持國柄；另一方面，則以豐厚俸祿及快速的陞遷，籠絡補償賴以打江山及禦外侮的武臣。故宋初的官制設計：武資要比文資陞遷較快，俸祿較豐。在宋初諸帝眼中，將有武幹之儒臣轉為武資，是賞識眷顧之表示，而不是貶責。要文臣轉為武資，絕對沒有委屈他們。好像在開寶四年(971)五月，從征南漢有戰功的隨軍轉運使、右補闕王明(919-991)，除了獲遷官為秘書少監外，還破例得領只有武臣才得到的遙郡刺史銜頭。開寶七年，太祖更正授他黃州刺史，將他從文資改為武資，並以他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充當水軍統帥，從征南唐。²¹ 太宗繼承太祖的做法，從雍熙四年五月到九月，當北伐失利，邊庭告急時，又將一批有武幹而表示願效命沙場的文臣，包括柳開等七人，改為武資，用以激勵他們用命。²² 從上面的事例去看，劉太后將劉平轉資為武官，其實並沒有薄待他之意。事實上，到了仁宗之世，不少文臣也贊成並鼓吹有武略之文臣轉換為武職，為國效命；並主張效法漢唐，將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職任，授給有武幹的人，而不管他本官是文資抑武階。²³

時代風尚以及實際需要也是宋初儒將輩出的原因。首先就需要來說，宋初雖然重文，鼓勵士庶以至武臣子弟讀書應舉以仕進；但外有西北二敵虎視，內有不絕之民變與兵變威脅，作為中樞大臣或地方長吏，倘沒有治軍統兵的能力，單靠文辭詩賦，是不會

²¹ 《長編》，卷十二，頁265；卷十三，頁293；卷十六，頁333；《宋史》，卷二百六十六，頁9178-80；卷二百七十，頁9265-67。考太祖在開寶五年(972)十二月擢用辛仲甫為西川兵馬都監時，便對辛表示，倘他能立功，他日亦會像王明一樣，獲授刺史。這可旁證太祖要王明換武資，是獎賞他的表示。按王明在太祖朝換秩為武資的刺史後，到太宗朝恢復為文資，遷給事中；後來又再一次換為刺史，最後又復為文資，官至禮部侍郎。王明雖然應試落第，但他的資歷及才學，則屬儒臣無疑，若將他列為儒將，也是合宜的。

²² 太宗在雍熙四年五月，以侍御史鄭宣(?-987後)、司門員外郎劉墀(?-989後)、戶部員外郎趙載(?-987後)並為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開為崇儀使，左拾遺劉慶(?-987後)為西京作坊使，他們均是應詔自願轉為武職的。數日後，又以左拾遺曹諫(?-988)為崇儀使知定遠軍(按：曹諫是曹利用之父)。是年九月，又將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石熙古(?-988後)改為尚食使知冀州。以上諸人中，劉墀後來在端拱二年(989)擔任易州刺史時與遼軍作戰，以城陷而降遼，成為敗軍之將。參見《長編》，卷二十八，頁637；錢若水：《太宗皇帝實錄》，《四部叢刊三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影印本)，卷四十一，頁1；卷四十二，頁2；伍伯常：《易州失陷年月考——兼論南宋至清編纂北宋歷史的特色》，載楊炎廷(編)：《宋史論文集·羅球慶老師榮休紀念專輯》(香港：香港中國史研究會，1994年)，頁1-3。

²³ 據葉夢得(1077-1148)的記載，在仁宗朝即有侍從多人，自文資換武資的觀察使。宋廷說服他們接受之理由，除了俸祿較優外，還有是「文武兼材」，教外國畏服。據說劉太后即以此理由說服陳堯咨(970-1034)自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換宿州觀察使出知天雄軍。參見葉夢得：《石林燕語》(侯忠義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四，頁52-53；《長編》，卷一百二十五，頁2951。

受到賞識和看重，而且也鎮服不了手下的驕兵悍將的。好像在淳化五年(994)初，當蜀民王小波(?-994)、李順(?-1017)在四川起事時，扼守東川重鎮梓州的戶部使、右諫議大夫張雍(938-1008)便因生於河朔邊地，素諳守禦之法而能夠力保危城。據宋人筆記所載，當敵兵未至時，他即爭取時間招兵練兵，並籌餉治械。等到兵臨城下，他就設方略堅守，並立於矢石中激勵士眾。他的智勇結果使梓州被圍八十日而得以不失。²⁴ 又好像在景德元年，當遼兵南犯時，禁軍老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935-1006)對才兼文武的宰相寇準必恭必敬，事事以寇準為馬首是瞻；但對大草包的簽書樞密院事馮拯(958-1023)則當眾不留餘地的臭罵，說馮拯「以文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何不賦一詩詠退敵騎？」²⁵ 從上述的事例，我們可以看到，宋代文臣若無武幹，碰到禦敵平亂的事時，是壓不住臺的。

其次，就時代風尚而論，宋初繼承五代尚武之俗，特別在西北二邊州郡的士庶，都習武不輟。在這背景風尚下，宋初的文臣，普遍文武兼修；有些甚至武藝不凡，能騎善射；有些熟諳韜略，議論縱橫。好像太祖朝最後一榜的狀元王嗣宗(942-1019)，武技不凡，據說即便靠手搏擊倒對手而奪魁的。又如真宗咸平三年及五年的兩個狀元陳堯咨和王曾(978-1038)，均是箭法卓絕的。另外劉平一榜的狀元李迪，韜略過人，洞曉兵事，曾被真宗譽為「真所謂頗、牧在禁中」。²⁶ 好像劉平這樣的將家子，文武兼修就順理成章。

²⁴ 《玉壺清話》，卷四，頁34-35。

²⁵ 《長編》，卷五十八，頁1285-87。

²⁶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開寶八年狀元。然他為人粗暴傲狠，性近武人多於文臣。除了武技不俗外，又自言知武事，曾多次上書論邊事；真宗祠汾陰，欲以大臣才兼文武的鎮守長安，王嗣宗自願自工部侍郎改武資出任，因授耀州觀察使。祥符六年授樞密副使，最後授節度使致仕。他算不算儒將，頗有商榷之處，雖然他是狀元，但他的「儒」氣質似乎不足。陳堯咨字嘉謨，閩州閩中人，是陳堯叟(961-1017)及陳堯佐(963-1044)之弟，他是咸平三年(1000)榜的狀元，工隸書，然他在兄弟中最少文，卻以善射著稱於世，號稱天下無雙。他以善射自矜，曾自號「小由基」，常以射矢為樂。他和王嗣宗一樣，後來自願轉為武資，官至節度使。他當過兩制，又以儒臣自命，不過應否將他視為儒將，當時也是見仁見智。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是咸平五年榜的解元、省元和狀元，他給人的印象是個道德文章俱一流的儒臣，其實他的箭法亦甚高明。據他的行狀載，他有一次出使遼國，比射時一矢中的，令遼人驚訝不止。李迪在大中祥符九年以翰林學士的身分入對，真宗問他對知秦州曹瑋(973-1030)請增兵以對付吐蕃唃廝囉(997-1065)的意見，李迪支持增兵，並因真宗之問，根據他任陝西轉運使時所作的紀錄本，將關隴形勢、兵糧數目逐一稟告真宗，真宗大為稱賞，將他比為戰國時趙國的名將廉頗和李牧。後來唃廝囉出兵，李迪預料曹瑋必勝，後來曹瑋果然得勝，真宗對李迪洞悉兵機之才華，越發欣賞。參見《宋史》，卷二百八十四〈陳堯咨傳〉，頁9588-89；卷二百八十七〈王嗣宗傳〉，頁9647-51；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下轉頁115]

劉平轉任武將，相信是他自願的。他以將家子而進士登第，出仕後又有平定內寇及擊退外夷之政績，別人稱許他有武幹時，大概他心中實以儒將自命。他出任環慶路鈐轄兼知邠州後不久，果然立下戰功，不負儒將之名。當反覆無常的屬羌明珠、磨糜族來犯時，他暗中出師，將之擊敗，並殺傷數千人，劉平因而以功領賓州刺史，徙鄜延路兵馬鈐轄。²⁷

天聖三年(1025)六月，環、原州屬羌內犯，一大批邊吏以兵敗被貶，劉平就在此時徙為涇原路鈐轄，充當涇原路副都部署兼知渭州、馬軍都虞候康繼英(?-1030後)的副手，代替因戰敗被除名的內臣王懷信。大概在在天聖六年正月前後，再兼知渭州，代替調知衛州的康繼英。²⁸不過，在是年四月，當丁謂的黨羽右諫議大夫胡則(963-1039)從新任知永興軍改為陝西都轉運使，成為劉平的頂頭上司時，劉平即上書宋廷，指斥胡則是丁黨，又說他自己與丁謂有隙，擔心胡則會尋他的過失致罪。丁謂及其黨羽這時已成為落水狗，人人喊打；劉平憑他文官的觸覺，自然曉得他這次上書攻擊他的上司胡則，是有利無害的。果然，宋廷為了安撫劉平，就將他從邊地的渭州調往內地、京西北路的汝州，而胡則也失去了陝西都轉運使的職務。劉平被任為知汝州不久，大概在這年八月，又改授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但他只行了數驛，又被召還。劉平這次真除信州刺史，並出知宋遼邊上的要塞雄州，從西邊移往北邊。大概劉太后以至當國

[上接頁114]

(成都：巴蜀書社，冊15，1991年3月)，卷六百九〈富弼二〉，〈王文正公曾行狀〉，頁35；《長編》，卷四十六，頁997-98；卷八十八，頁2013；《東都事略》，卷四十四〈陳堯咨傳〉，頁667-68；王闢之(1031-1098後)(著)、呂友仁(校點)：《澠水燕談錄》(與《歸田錄》合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九，頁113；歐陽修(1007-1072)(著)、李偉國(點校)：《歸田錄》，卷一，頁9-10。

²⁷ 《長編》，卷一百一，頁2330，2334；卷一百三，頁2384；《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500。關於明珠等族犯境之年月，《長編》亦不得其時，考天聖三年七月前，任環慶路鈐轄者為內臣內園使王懷信(?-1025後)。按劉平本傳稱他敗明珠族後，即以功遷賓州刺史，並自環慶徙鄜延路鈐轄，王懷信顯然是接劉平之任，以此推之，劉平立功陞官，應該在天聖三年七月前。又考天聖元年十二月，鄜州鈐轄劉寶(?-1023)以過罷兵職為右監門衛將軍，不知劉平是否在這時徙為州鄜延路兵馬鈐轄。

²⁸ 《長編》，卷一百三，頁2383-89；卷一百六，頁2463，2471；卷一百七，頁2494；《東都事略》，卷三十四〈康繼英傳〉，頁551-52；周應谷(?-1260後)：《景定建康志》，《四庫全書珍本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二十六〈侍衛馬軍司題名記〉(郭倪(?-1203後)編)，頁33。考康繼英在天聖三年九月，以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出為涇原路副都部署兼知渭州，據《長編》、〈侍衛馬軍司題名記〉及《東都事略·康繼英傳》綜合記載，康繼英在天聖二年三月除馬軍都虞候，三年十月(按：年表漏「三年」二字)陞殿前都虞候加桂州觀察使，六年正月罷軍職遷建州觀察使，徙知衛州，而劉平在是六年四月已知渭州上書，以此推之，劉平兼知渭州，當早在六年正月前後。

的王曾、張士遜(964-1049)及呂夷簡(978-1043)等都覺得劉平將才難得，把他放在江淮內地，負責漕運，實在未人盡其才。²⁹

劉平在雄州前後四年。他的政績不俗，在惠民方面，他一到任，便做了幾件好事。大概在他的請求下，在天聖六年九月，雄州被水的民家得免交蒲魚稅錢；另在同年十一月，雄州歸信、容城兩縣的供輸人戶，也得免為衙前軍將。³⁰ 在刺探遼國情報方面，他也做得非常稱職。天聖九年(1031)六月，遼聖宗(982-1031在位)病逝，雄州方面便迅速地將有關消息，包括遼朝之政局變化上報宋廷，讓宋廷馬上做好應變措施。當然，他以兼任沿邊安撫使的身分，也不時陳奏備邊之策略，這是符合他儒將的身分，也增加宋廷對他的賞識。³¹ 劉平在雄州的四年中，宋廷和遼朝先後發生重大的人事變故：先是在天聖七年(1029)正月，權傾朝野的樞密使曹利用(971-1029)被政敵攻倒，受牽連的人甚眾；³² 然後是天聖九年六月遼聖宗病死。幸運的是，身處雄州的劉平並未受到這兩番變故波及：當年勾結丁謂，有分逼害寇準和李迪的曹利用，並沒有推薦劉平，他的垮臺也就不會株連劉平。至於主張對宋言和的遼聖宗雖死，繼位的遼興宗(1031-1055在位)雖有野心，但自顧不暇，並沒有立時改變對宋的和平政策，陳兵宋境。³³

明道元年(1032)初，劉平以改元之故，從信州刺史陞為忻州團練使。是年八月，他自雄州徙知河北重鎮真定府(即成德軍或鎮州)，代替以疾不能赴任的錢惟濟(978-1032)。³⁴ 在明道二年(1033)三月，劉平找到一個機會上書，建議在遼騎出入要害之

²⁹ 《長編》，卷一百六，頁2471，2475，2479，2486；《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500。據《長編》，天聖六年七月甲午，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張綸(?-1028後)以捍海堰成之功，領昭州刺史，同年八月甲戌，張綸自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文思使、昭州刺史改知秦州。又據《長編》所載，張綸在天禧末年已為發運副使，則劉平當在是年八月張綸改知秦州時才除授發運副使。另胡則罷陝西都轉運使後，改授權判吏部流內銓，到是年十二月，卻以坐失保任，降為太常少卿知池州。

³⁰ 《長編》，卷一百六，頁2481，2484；《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500。

³¹ 《長編》，卷一百一十，頁2559-63；卷一百一十一，頁2608。按《長編》卷一百一十除記遼聖宗死訊外，更詳載從遼聖宗病重時至遼興宗(1031-1055在位)繼位後遼廷之權爭狀況，很有可能這番記載源出雄州的奏報。又劉平在雄州時之奏疏，並沒有保存下來，只是從他後來之奏議知道他當時兼沿邊安撫使，曾與安撫都監劉志(?-1033後)陳奏備邊之略。

³² 《長編》，卷一百七，頁2491-98。按宋廷曾想將曹利用舉薦擢用的邊將罷去，但殿中侍御史鞠詠(?-1031)反對，請一切勿治，以安反側。宋廷最後接納他的意見。是故包括劉平在內的邊臣都沒有因曹利用之貶而更動。

³³ 考遼興宗繼位後，其母法天太后(?-1034後)專制其國，多殺功臣，興宗一直受制。直至景祐元年八月，興宗才成功發兵逐走其母，誅殺其黨，而奪回大權。遼國之內憂，大概為劉平所探知，所以他後來上書，請趁機修方田。參見《長編》，卷一百一十五，頁2696-97。

³⁴ 《長編》，卷一百一十一，頁2580；卷一百一十二，頁2608-9；《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500；《東都事略》，卷一百一十，頁1684。按《東都事略·劉平傳》以劉平遷慈州團練使。

處，東西不足百五十里之地帶，廣置深溝方田，以扼塞遼騎。他又說趁著遼國內多事，兵荒相繼之時，就以引水植稻為名，乘機開通縱廣一丈，深兩丈，鱗次交錯的方田，以鞏固國防。他的計劃得到宋廷的贊同，他獲授命與西路緣邊巡檢都監楊懷敏(?-1050)漸次興建方田，而其將略也進一步得到宋廷欣賞。³⁵

劉平上書後八天，垂簾專政達十二年的劉太后病逝。仁宗親政後，改組政府，被仁宗認為是劉太后親信的一大批宰執大臣，包括首相呂夷簡在內被罷免。劉平的兩個同年李迪和李諮，則受到重用：李迪回朝出任次相，而李諮則由權三司使陞任樞密副使。到十月，呂夷簡復相，另寇準婿王曙(963-1034)拜樞密使。朝中有人，劉平從此仕途亨通。³⁶

仁宗親政的第二年，改元景祐。是年二月，大概是呂夷簡及李迪之推薦，仁宗特別擢用劉平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並晉陞為永州防禦使，徙知定州。仁宗並且對左右說：「平，所謂詩書之將也。」許劉平為儒將。劉平從此成為位僅在二府之下的三衙管軍，位居將帥之列。這年劉平已六十二，算得上是大器晚成。³⁷

當劉平仕途得意時，在這年正月，夏主元昊開始侵犯府州。直至是年閏六月，宋廷尚未察覺其嚴重性，只詔并代部署司嚴備。³⁸ 劉平在定州，看出元昊實未可輕視，於是上書仁宗，說他在陝西時，曾見元昊僭用車服。他判斷元昊有反叛之心，請求仁宗嚴備；但仁宗不以為然。到這年七月，元昊再進攻環慶路，並兩番擊破宋守軍，這時仁宗想起劉平之言，於是將他調任為環慶路副都部署，專責對付元昊。劉平赴任前，仁宗又特別召見，對他慰撫一番，說知他有將略，所以委以邊庭重任，勉他盡心。另外又加賜他錢百萬。³⁹

劉平在景祐元年十二月再連跳兩級，晉陞為步軍都虞候，接替自請解職的曹儀

³⁵ 《長編》，卷一百一十二，頁2608-9；《宋會要輯稿》，〈兵廿七之卅六〉。

³⁶ 《長編》，卷一百一十二，頁2609-14；卷一百一十三，頁2641-42。繼呂夷簡出任首相的是仁宗宮僚張士遜；不過，他做不了半年便被罷，而呂夷簡復為首相。李迪是仁宗當太子時的太子賓客，在真宗晚年一直維護仁宗，所以仁宗親政後，馬上召還拜相。另外仁宗還召還因替他說話而被貶太常博士的范仲淹，用為右司諫。另一方面，在是年十月，曾為仁宗宮僚的王曙拜樞密使，在王曙的影響下，寇準得到完全平反。

³⁷ 《長編》，卷一百一十，頁2570；卷一百一十五，頁2692；卷一百一十七，頁2761；《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500。考宋制：殿前、馬軍、步軍司之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及上四軍之捧日天武四廂、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為管軍，位次二府執政，而與文官之僕尚八座相當。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是序位最低之三衙管軍，劉平大概是填補天聖九年十一月罷此職的袁正(?-1031後)之遺闕。

³⁸ 《長編》，卷一百一十四，頁2662，2682。

³⁹ 同上注，卷一百一十五，頁2691-92。

(982-1036)。⁴⁰ 不過，官運亨通卻使他有點得意忘形。大約在這年年底或二年(1035)初，他有一次喝了酒，擅自打破甲仗庫的鎖，結果被陝西轉運使蘇耆(987-1035)奏劾。當過多年御史的劉平不服氣，要與蘇耆在御史臺對質。雖然蘇耆在二年正月病卒，無法對質；但朝中文臣，尤其是臺諫，並不就此罷休，繼續彈劾他；經過數月折騰，劉平雖得免劾，但宋廷爲了給他點教訓，便在是年四月，罷除他管軍之職，改授饒州防禦使，徙知同州。爲了一件小事而遭受解除管軍之處分，劉平自然深深不忿。⁴¹ 當然，仕途榮枯，是誰也料不準的。好像劉平的同年，官居次相的李迪，就在這年二月中了首相呂夷簡的圈套，而被罷黜。而李諮反而因原樞密使王曾復相，而得以陞任爲知樞密院事。罷劉平管軍是誰出的主意？史所未載，但後來劉平傾力去巴結呂夷簡，看來他心內明白，呂夷簡是開罪不起的。他在朝中若無有力靠山，是難有作爲的。⁴²

跌了一交的劉平，算是經一事，長一智。不知是否透過李諮的關係，他得到宋廷(主要是呂夷簡)的諒宥。是年八月，他上疏自陳勇略。儒臣出身的劉平自然比一勇之武夫懂得說話，結果打動了仁宗，召他入對。他應對得體，在呂夷簡的同意下，仁宗復任

⁴⁰ 曹儀是曹璨(950-1019)子，曹彬(931-999)之孫，他因曹皇后(1016-1079)新立，以外戚避嫌，請解管軍之職。考宋制：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當先選捧日天武四廂，才選步軍都虞候。劉平所以越過捧日天武四廂，逕陞步軍都虞候；可能因爲早在十月底，馬軍都虞候張守遵(?-1036)因兵敗而遭解職，而本來順序替補爲馬軍都虞候的曹儀又辭職，結果就讓張潛(?-1039)和原龍神衛四廂的劉平各跳兩級，分別陞任馬軍和步軍都虞候。按在明道元年九月前擔任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的是龔州防禦使高化(969-1048)，他在是年九月以兵敗被降職爲滑州部署，可能同時被罷管軍，只是《長編》漏記而已。他後來的軍職雖一直比劉平高一級；不過群書均沒載他曾自捧日天武四廂遷步軍都虞候，看來他是停了好幾年管軍，直至景祐四年閏四月才復任馬軍副都指揮使。至於張潛在景祐元年十二月拜馬軍都虞候之前的軍職不詳；我相信他是在明道元年九月接高化之缺，任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然後再在景祐元年十二月超擢爲馬軍都虞候。參見《長編》，卷一百一十七，頁2589；卷一百一十五，頁2706-7；卷一百一十六，頁2717；卷一百二十六，頁2970；《侍衛馬軍司題名記》，頁33。《宋史》，卷三百二十三〈高化傳〉，頁10456-57；卷三百二十五，頁10500。另劉平陞任步軍都虞候之年月，《長編》及《宋史》均未載具體月日，考曹儀在景祐元年十二月解職，而據《侍衛馬軍司題名記》，張潛在同年十二月繼張守遵任馬軍都虞候，劉平接曹儀之職，相信亦在是月。

⁴¹ 《長編》，卷一百一十六，頁2729；卷一百一十八，頁2788-89。按《長編》卷一百一十八稱，劉平在知定州日爲轉運使蘇耆所劾，此與卷一百一十六所載不合，考蘇耆從未擔任定州所屬的河北路轉運使，而在景祐二年則前任陝西轉運使，轄區正包括劉平所在之環慶。《長編》卷一百一十八所記明顯有誤。據蘇舜欽所撰之蘇耆墓誌銘，蘇耆卒於景祐二年正月十三日，他奏劾劉平，當在景祐元年底或景祐二年初。參見《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卷七〈先公墓誌銘并序〉，頁466-69。

⁴² 《長編》，卷一百一十六，頁2721-23。

他爲管軍，而且官陞一級，拜馬軍都虞候，徙知黃河邊上的澶州。這時朝議治理黃河，劉平上言不懂治河，要求調職，結果徙爲滄州副都部署。⁴³

景祐三年(1036)始，權知開封府范仲淹，不滿宰相呂夷簡專權用事，一再上書批評呂之過失。呂夷簡大怒，除在仁宗前自辯外，更指控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及離間君臣。結果在這年四月，范仲淹被貶知饒州。朝臣對呂范之爭的反應有三：極少數的人如天章閣待制李紘(?-1041後)、集賢校理王質(999-1043)、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及歐陽修(1007-1072)等，不怕被人指爲范的朋黨而丟官，他們或公然送別范，或仗義執言，上疏爲范仲淹申理。多數人畏懼呂夷簡權勢，不敢說話。而最不堪的一小撮人，好像王旦之長婿、同知樞密院事韓億(972-1044)便要和范劃清界限，免受牽連；而好像侍御史韓瀆(?-1036後)、右司諫高若訥(997-1055)等更爲了取悅呂夷簡，而對范等落井下石。⁴⁴ 本來文臣間之傾軋，與早轉爲武臣的劉平無關；但自命儒將的劉平，擺脫不了儒臣好意氣、喜投機之不良習性，再一次主動介入黨爭。

大概在范仲淹貶後不久，劉平便上書朝廷，攻擊范仲淹等人，以討好呂夷簡。他在奏中稱范仲淹等敢毀謗大臣(按：指呂夷簡)，必定有人在背後指使，目的在逐走大臣，以便取而代之。用陰謀論危言聳聽一番後，他進一步揚己抑人地說，他在真宗朝爲御史，他的同列(包括呂夷簡)沒有像范仲淹等那樣姦邪朋比與詐忠賣直的。然後他又舊事重提，指責臺諫官議事過度，竟連他這樣的管軍將校也管到。他半發牢騷地指出，武人的進退，與儒臣不同；倘若刻意揶揄武臣之小過失，而妄加劾奏的話，就會影響打擊軍心士氣。接著，他順著呂夷簡的意思，請求仁宗明諭臺諫官，不許越職，不許互相引薦。倘有缺員，就由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的人出任。⁴⁵ 劉平這番交心表態的話，顯然博取得呂夷簡的好感。他是故技重施，當年他上書攻擊朝野俱憎惡的丁謂，博得疾惡的美名；今番卻是迎合呂夷簡，對有賢者之稱的范仲淹落井下石。他這個儒將，只怕在正直的人眼中，是小人儒，而非君子儒了。爲一時之利害，而這樣不分是非，投機取利，劉平似非智者。

景祐三年十二月，劉平的同年，知樞密院事李諮病逝。翌年四月，呂夷簡與王曾相攻，結果雙雙罷相。劉平連失兩個有力靠山，不過，於仕途無大影響，反而在是年閏四

⁴³ 同上注，卷一百一十七，頁2752；《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500；〈侍衛馬軍司題名記〉，頁33；陳均(1174-1244)：《九朝編年備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頁28。按《宋史》以劉平復管軍爲步軍都虞候；而《九朝編年備要》記景祐三年五月劉平劾奏范仲淹時，官步軍都虞候知滄州；惟〈侍衛馬軍司題名記〉載劉平於景祐二年八月任馬軍都虞候，接許懷信(?-1035後)之職，正合《長編》所記劉平復管軍之年月，〈侍衛馬軍司題名記〉。

⁴⁴ 《長編》，卷一百一十八，頁2775，2783-87。

⁴⁵ 同上注，頁2788。

月，因殿前都指揮使夏守贊(977-1042)被罷，而得以依次陞為殿前都虞候。更令他愜意的是，當年打擊過他的丁謂，也於是月病卒於光州貶所。⁴⁶

劉平陞官後，一度調往北邊，任高陽關副都部署。⁴⁷ 寶元元年(1038)初，元昊開始窺伺河東，但宋廷並未察覺其嚴重性。劉平於是年復任為環慶路副都部署，到這年十月，元昊稱帝，宋廷見元昊反跡已顯，於是在是年十二月將劉平徙為鄜延路副都部署，加邕州觀察使，希望他在元昊侵宋的前沿延州一線，能制得住元昊。另外，又以前樞密副使、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延州范雍(979-1046)兼鄜延路都部署、鄜延環慶路安撫使，作為劉平的直屬上司。為了統一鄜延環慶兩路兵馬的指揮，宋廷又命劉平兼鄜延環慶路安撫副使。⁴⁸ 劉平接受新任命後，於是年四月，上書宋廷，請向陝西緣邊都部署司頒下將令，如遇敵寇犯邊，令諸路會兵，互為應援。劉平的建議很快得到宋廷的採納。⁴⁹

對於元昊的犯境，在京的宋廷文官多半掉以輕心，好像天章閣侍講賈昌朝(998-1065)便以為憑宋廷在陝西的兵力，元昊不足慮。倒是帶過兵，守過西邊的武將，乃知道宋軍的弱點。這年五月，自真定府路都部署復任為知樞密院事的夏守贊，便告訴仁宗，西邊許多小寨屯兵馬不及千人，只可以防禦草寇，倘元昊兵大至，能否守得住都成問題，更不要說出擊。針對宋軍兵力分散的弊病，夏守贊建議將小寨兵馬合併，扼守要衝，然後伺機邀擊敵兵。他的建議得到仁宗的採納。⁵⁰ 除了改善宋守軍之消極防禦系統外，宋廷重施故智，用以夷制夷之策略，以結好吐蕃唃廝囉，來對付元昊。另外，宋廷又任命兩員宿將，殿前都虞候石元孫為鄜延路副都部署，博州團練使劉謙(?-1040)為環慶路副部署(按：劉謙在寶元二年十一月再徙涇原)，作為劉平的副將，加強西邊的防禦。又為了集思廣益，宋廷再下詔，令邊臣提出抵禦元昊的辦法。前任樞密副使、現知永興軍的夏竦(985-1051)，在是年六月，即提出他有名的禦戎十策，包括：(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號

⁴⁶ 同上注，卷一百一十九，頁2812；卷一百二十，頁2826-27，2830；卷一百二十二，頁2887；卷一百二十六，頁2970；〈侍衛馬軍司題名記〉，頁33-34。考夏守贊罷殿帥同時，鄭守忠(?-1042)自馬軍副都指揮使拜殿前副都指揮使，高化拜馬軍副都指揮使，劉平於是順次補為殿前都虞候。劉平拜殿前都虞候，宋廷賞他良駒，並賜敕書褒獎，由宋庠撰寫的敕書，稱他「輟自衛廬，往來邊壘。訓齊甫爾，感敘勤斯」。是故「載閱右牽之良，彌昭中蘊之恪。眷言嘆矚，無廢於懷」。參見宋庠：《元憲集》，卷二十八〈賜殿前都虞候劉平進謝到任馬敕書〉，頁302-3。

⁴⁷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500。按劉平調高陽關及返回環慶之年月不詳。

⁴⁸ 《長編》，卷一百二十一，頁2849；卷一百二十二，頁2877，2880-83，2887-88；卷一百二十三，頁2892。

⁴⁹ 同上注，卷一百二十三，頁2903。

⁵⁰ 同上注，頁2905-7。

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夏竦雖然爲官投機，爲時人所鄙薄；但不以人廢言，他這番不尙高論，反對盲目興師，而主張先加強防禦的看法，平心而論，符合了先求己之不敗的正確取向，在當時確是可取可行的辦法。⁵¹

這年七月，仁宗再命劉平兼管勾涇原兵馬事，一人統率環慶、鄜延、涇原三路的兵馬。在此之前，劉平已再陞一級爲步軍副都指揮使，成爲步軍司的長官，在三衙管軍中名列第三，僅次於殿副帥鄭守忠(?-1040後)和馬副帥高化(966-1045)之後(按：當時三衙都不除授都指揮使，而以副都指揮使爲長官)。官階方面，劉平又從觀察使晉陞爲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是年劉平六十七歲，這是他在官場及沙場拚搏一生所得到的最高官位，假若他後來不是戰敗被俘，他甚至大有可能更上一層樓，陞任馬軍或殿前副都指揮使，並且建節爲節度使，說不定更晉身二府。⁵²

無論仁宗或多數的文臣，包括素來頭腦清楚的直集賢院富弼(1004-1083)，都認定沙場老將的劉平可當大任，可以打敗元昊。⁵³ 劉平本人也自信十足，他大概看不起比他足足年輕三十年的元昊。在是年閏十二月，他再奏上一篇洋洋千言的攻守之策，他認爲元昊恣行殺害國中異己，已眾叛親離；而在外又與唃廝囉相持日久，結怨甚深。他判斷在內外交困下，元昊敗亡在即。他主張趁此機會，集結陝西四路兵馬廿萬，分兵兩

⁵¹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出身將家子，以父戰死而憑蔭入仕。他博學多才，受王旦所知，但後來爲了急於進取，依附王欽若，傾側反覆，被人視爲姦邪。他其實文才武略都有可觀之處，在仁宗朝先後兩任樞副，一任參政，屢典大藩，最後官至樞密使。誠如劉子健氏之論，他其實也可列入儒將之列，但宋人普遍視之爲姦邪，自然不以儒將視之。考夏竦在他這篇洋洋數千言的奏章中，曾兩處提到劉平，認爲由劉平守環慶，可以無憂。他以爲西邊以涇原及環慶兩路最須防禦，因而建議罷去劉平鄜延安撫副使之職，改爲兼任涇原路總管。宋廷後來以劉平兼任三路兵職。參見夏竦：《文莊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四〈陳邊事十策〉，頁1-14；《長編》，卷一百二十三，頁2909-13；卷一百二十九，頁3056；《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夏竦傳〉，頁9571-77；劉子健：〈從儒將的概念說到歷史上對張浚的評論〉，頁484。

⁵² 《長編》，卷一百二十四，頁2918-19；《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501；《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一之一七〉。按劉平陞任步軍副都指揮使之月日不詳，《宋史·劉平傳》記得含糊，給人錯覺是劉平陞任步副帥，在兼管勾涇原兵馬事之後。據《會要》及《長編》，劉平之前任桂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張潛卒於寶元二年五月，而石元孫早在寶元二年六月，即以殿前都虞候爲鄜延路副都部署，劉平當於是年五月或六月自殿前都虞候陞任步軍副都指揮使。另外在名義上，劉平的頂頭有知涇州兼涇原秦鳳路緣邊經略安撫使、涇原路都部署夏竦，以及知延州兼鄜延環慶路緣邊經略安撫使、鄜延路都部署范雍，但夏范二人都是文臣。

⁵³ 《長編》，卷一百二十四，頁2931。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道，裹糧出塞二百里。他認為不出一月，就可擊破兵僅五、六萬的元昊，取得洪、宥等州，然後招集當地土豪，授以職名官位，賞給衣祿金帛，讓他們自行治理本族。他認為宋軍取得洪、宥等州後，就可以山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配置適量的戍兵鎮守，使之成為宋的國防天險。為了斷元昊左右臂，他又主張授唃廝囉為靈武節度使、西平王，使他進逼依附元昊的河外族帳。然後宋廷出鄜、延、石州蕃漢步騎，以厚賞及授地來招收河西部族，使之臣服宋朝，不附元昊。他認為元昊失去河內河外蕃族，就如窮寇，不能為患。他力主出兵擊破元昊，認為不如此，既有縱寇之患，且會被遼國所輕視，而且將來二國聯合謀宋的話，就更危險了。⁵⁴ 劉平這番議論比夏竦的禦戎十策要高調得多，對昧於邊事而對軍事外行的朝中文臣自然動聽。但他對從未交過手的元昊，如此輕視低估，他的將略實教人有所保留。當宋廷仍陶醉於十一月保安軍之小勝，而對夏竦之穩重建議不予重視之時，知延州范雍已看出宋的防線太長太闊，而使守軍力量分散之弊。他對劉平、趙振(?-1049後)所在的環慶路，以及高繼嵩(?-1040)所在的涇原路並不擔心，惟對延州以東一線防務，即保安軍一線十分憂慮，特別是守將許懷德(978-1061)及鄜延都監黃德和不得軍心，容易給元昊乘虛侵入。⁵⁵ 不幸范雍所料不差，元昊不久就向延州一線突襲。當劉平的奏疏還未抵京前，宋夏大戰已展開。

三、敗將與楚囚：劉平儒將神話的破滅

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率軍十萬南下，大舉侵宋。元昊首先用聲東擊西的策略，一舉攻下延州外圍要塞金明寨，生擒驕傲自大的守將李士彬(?-1040後)。然後乘勝南下，進圍延州。知延州范雍慌了手腳，急調在慶州的劉平，在保安軍的石元孫以及其他部隊，合步騎萬人來援。稱得上軍事天才的元昊再施展圍點打援的戰法，在延州外的三川口佈下重重羅網，等待來援的宋軍跌入陷阱。劉平一向輕視元昊，竟看不出敵軍的企圖。他恃勇輕進，結果中伏。劉平率軍力戰，且身中兩箭，終因眾寡懸殊而不敵。劉平及石元孫等五將被俘，除了後軍黃德和部千人臨陣先遁外，宋軍能逃脫的，只有驍將王信(988-1048)、盧政(1007-1081)等少數人，其餘均被殲。⁵⁶

⁵⁴ 同上注，卷一百二十五，頁2956；《宋會要輯稿》，〈兵廿七之卅六〉。劉平在是年七月曾上奏，建議將小寨人馬糧草併入大寨，不必逐處設防，只須留下強壯探子，賊來就自內地出兵掩襲。他的建議和先前夏守贊的看法相同。

⁵⁵ 《長編》，卷一百二十五，頁2941，2944-45，2953-55，2958-60。

⁵⁶ 除了劉平、石元孫外，同時被俘的宋將還有傅偃(?-1040後)、劉發(?-1040後)和石遜(?-1040後)。按黃德和逃脫後，先遁還延州，但范雍不納。他改走鄜州，為知鄜州、興州防禦使張宗誨(969-1045)所納，但張宗誨馬上拘留黃德和於館舍。王信，字公亮，太原人，應澗州軍籍，積功以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隨劉平救延州。他在三川口之重圍中，殺敵數十而脫身，他後來屢經戰鬥，多立戰功，最後以平定貝州王則(?-1048)有功，官拜步軍副都指揮使。盧政也是太原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參預三川口之戰，奮戰得脫。他後來多立戰功，包

[下轉頁123]

劉平平生以儒將自許，這次慘敗，卻教人看清楚他勇則勇矣，智謀將略其實有限。⁵⁷ 以前未遇上真正的敵人時，他可以侃侃而談，令軍事外行的文臣為之折服，從而捧他信他，倚為國之柱石。劉平碰上的敵人是百年不遇的軍事天才元昊，可說不幸。加以西夏軍數量倍於宋軍，偏偏他既沒有知彼之智，又沒有自知之明，焉能不敗？⁵⁸

〔上接頁122〕

括隨狄青(1008-1057)平儂智高，至神宗時，官至殿前副都指揮使。參見《宋史》，卷三百二十六〈王信傳〉，頁10518；卷三百四十九〈盧政傳〉，頁11055-56；卷四百八十五〈夏國上〉，頁13996；《隆平集》，卷十九〈王信傳〉，頁720；《河南集》，卷十七〈秘書監致仕張公墓誌銘〉，頁2-4。

⁵⁷ 據宋人事後之評論，劉平所犯之軍事錯誤甚多。首先，他一開始就沒有去偵察元昊部隊的位置和意圖，而是盲目地應援。據司馬光引述張景(?-1042後)之說法，在正月廿日晨，當劉平與部眾商議進兵時，他的部將郭遵(?-1040)指出宋軍未知敵人虛實而貿然進軍，必敗無疑，請求劉平暫時不動，等偵察清楚才進軍。劉平不聽，反以郭遵懦弱，下令馬上進軍。其次，他又沒考慮他和石元孫的部隊在短時間內來回往返保安軍，人馬早已疲乏，應該稍事休息，然後才進軍，不應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趕去延州，將自己部隊弄到芻糧不繼，後援不至之境地，給敵軍有以逸待勞的優勢。據張景說，劉平在雪地急行軍數十里，竟沒有考慮許多軍士仍未進食。後來鄜延鈐轄張亢(994-1056)便批評劉平之敗，正在於他貪功輕進。第三，在臨陣指揮及應變方面，劉平也不見得高明。據張景及魏泰(1050-1110)所記，劉平進軍至距延州二十里的大柳樹後，竟然輕易相信元昊派來、假冒范雍使者的話，而令部隊單騎前進，等到發放五十隊人馬後，才發覺掉入元昊之陷阱。另張亢也指出，在戰鬥初段，劉平的前鋒軍馬陷敵的有四指揮(二千人)，他竟全然不知，正因他不曾命部隊以旂幟為暗號。而在戰鬥中段，他又上了元昊詐敗之當，陷入重圍而不自覺；到戰鬥末段，又不能聽取部將盧政之正確意見，火速佔據制高點以鞏固防線，安定軍心。結果當黃德和的後軍帶頭從娘娘谷向鄜州逃跑，軍心馬上動搖而兵潰。事實上，戰事開始時，已有人上書朝廷，說劉平有勇無謀，戰則必敗，當時宰相(應是張士遜)不信，還將上書人問罪。另劉平的同年，時任知雜御史的司馬池也一早說劉平好自用而少智謀，必誤大事。參見《長編》，卷一百二十六，頁2967-68；卷一百二十八，頁3026-27；卷一百三十二，頁3140；卷一百三十三，頁3175；《隆平集》，卷十四〈司馬池傳〉，頁539；《宋史》，卷三百四十九，頁11055-56；司馬光(著)、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四，頁78-79；魏泰(著)、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九，頁105-6。

⁵⁸ 據魏泰所記，統軍打敗劉平及石元孫的夏將，是夏明堂左廂都統剛浪凌(?-1044後)和天都右廂都統野利遇乞(?-1044後)。二人既能用兵，所部又極善戰(按：二人後為元昊所殺)。關於元昊出兵攻宋之總兵力，號稱十萬，若打個折扣，相信也不少於五六萬。雖然集結在三川口伏擊劉平軍之夏軍人數未載，但相信至少倍於宋軍。維護劉平的宋臣如王堯臣(1003-1058)及韓琦均以劉平寡不敵眾而敗；不過，劉平之敗，不完全因眾寡懸殊而不敵，也實因他料敵無方所致。為劉平作傳的曾鞏，一方面說劉平「其帥鄜延，初上攻守之策，不為不知邊事」；但也承認劉平是「特志常輕賊，而自處以必勝」，終於因驕兵而敗。見《長編》，卷一百三十一，頁3098；卷一百三十二，頁3140；卷一百六十二，頁3901；《隆平集》，卷十九，頁724；《東軒筆錄》，卷八，頁94-95。

三川口之敗，戳破劉平無敵的神話，對宋廷文臣來說，更不幸的是，劉平及石元孫被內臣監軍黃德和指控降敵，以致宋軍覆師。一向賞識劉平的仁宗，可以接受劉平戰敗，卻不能忍受他降敵。自尊受損之下，仁宗查也不查，問也不問，就相信黃德和一面之詞，下令拘捕劉平家屬，包括剛在籠竿城擊敗夏人的劉平弟劉兼濟一家。氣節是儒將最重要的品質，被推崇為儒將的劉平，怎樣也不可有降敵的行為。宋廷文臣為了維護他們以至宋廷的尊嚴或面子，大概也為了私人的交情，以及他們對內臣監軍的憎惡，眾多文臣紛紛上言，要求徹查黃德和之指控，要為劉平討回公道。當時，除了知樞密院事夏守贇上書為他辨冤外，在朝中甚有影響力並負時望的文臣，包括他的老同年陝西都轉運使張存，以及天章閣侍講賈昌朝、龍圖閣直學士任布(975-1052)、知諫院富弼、陝西安撫使韓琦(1008-1075)、河東都轉運使王沿(?-1044)、知制誥葉清臣(1000-1049)及龍圖閣學士、權發遣開封府事晁宗慤(?-1042)等人均為劉平說話。仁宗頭腦清醒過來後，首先釋放劉、石家人，並賜財帛慰撫，跟著委派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及天章閣待制龐籍(988-1063)往河中府審查此案。在文臣一面倒之維護下，加上劉平部將盧政挺身而出，在仁宗前為劉平辯護，而延州吏民又詣闕力證劉平戰死，沒有降敵；另黃德和及其同黨盧守勳(?-1042後)，都不是仁宗特別寵信的內臣。結果，在這年四月，是案審結。劉平及石元孫被判定並未降敵，他們都因「力戰而死」，而得到很厚的恩恤。劉平獲追贈為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石元孫獲追贈為忠正軍節度使兼太傅(按：是年八月，宋廷發現劉、石二人初贈節度使，應先授化外的，結果劉改贈朔方節度使，石改贈定難節度使)。劉平家並獲賜信陵坊第，劉妻趙氏(?-1040後)封南陽郡太夫人，弟劉兼濟自左侍禁超授內殿崇班知原州兼涇原路都監，仁宗且召見兼濟，勉他為兄復仇。劉平其餘子弟共十五人，已仕的皆得到優遷，未仕的特授官，石元孫子孫七人也受恩恤。至於誣人降敵而被證明臨陣先遁的黃德和，則被腰斬於河中府，並梟首於延州城下。劉平僕夫王信(?-1040)以串同黃德和誣告主將，亦被杖殺。⁵⁹

⁵⁹ 宋廷文臣中，主審此案的文彥博和龐籍最維護劉平，有人想替黃德和翻案，但被文彥博嚴詞拒絕。而在大半年後陞任參政的晁宗慤，更為劉平、石元孫二人力辯並未降敵，並力主給已「戰歿」的二人褒贈。文彥博是劉平同年陳貫的女婿，考陳貫在三川口一役前兩月，即寶元二年十一月雖已病逝，然文彥博審理此案時，論理仍多半會考慮乃岳同年的情分。又仁宗在結案後，厚恤劉家。據宋祁(998-1061)所記，仁宗以禁卒千人撥歸劉兼濟帳下。劉出知原州前，仁宗又將他官陞一級，自內殿崇班擢內殿承制。劉兼濟出守原州，宋祁曾贈他詩，相信是奉仁宗之命，以榮寵之，詩末兩句說：「行期雪家恥，三捷奏天闕。」參見《宋史》，卷十，頁207-9；卷三百五〈晁宗慤傳〉，頁10087；卷三百一十一〈龐籍傳〉，頁10199；卷三百一十二〈韓琦傳〉，頁10222；卷三百一十三〈富弼傳〉，頁10250；〈文彥博傳〉，頁10258；卷三百二十〈張存傳〉，頁10413-14；卷三百二十五〈劉兼濟傳〉，頁10504；卷三百四十九，頁11055；卷三百五十〈和斌傳〉，頁11079；《長編》，卷一百二十六，頁2970-72，2988-91；卷一百二十七，頁3007；卷一百二十八，頁3032；《河南集》，卷十四，頁

(下轉頁125)

這次三川口之敗，宋廷的文臣總算找到黃德和這隻替罪羊，保存了朝廷的顏面。另一方面，爲了激勵士氣，以勸後人，宋廷就刻意地將劉平、石元孫弄成忠義的樣板，並昭告天下，繪聲繪影地說劉平如何「罵賊不食而死」，以成全劉平儒將的完美形象。然而，事與願違，劉、石二人並未像部將郭遵等那樣戰死沙場，而是被俘後偷生於夏都興慶府。據《宋史·劉平傳》所載，後來有降羌透露真相，說劉平不但不死，居然以老邁之身，在興慶府娶妻生子；不過，這樣尷尬的事，宋廷是寧可不信及諱莫如深的。⁶⁰

教宋廷無奈的是，在慶曆五年(1045)五月，即三川口之戰後五年，夏人因與宋言和，就將囚禁五年多的敗將石元孫釋回。這教宋廷面目無光，當年大張旗鼓營造的忠臣烈士，竟是偷生苟活的楚囚。昭告天下已壯烈成仁的「勇將」，卻突然活著歸來，如何向臣民交待？文臣們老羞成怒，將一口怨氣發泄在垂垂老矣的石元孫頭上。臺諫官除了侍御史王平(983-1045)爲石元孫說情外，其他人都奏石元孫軍敗不死，爲國之恥辱，請斬之於塞下，以示夏人。次相陳執中(990-1059)請如其奏，幸而首相賈昌朝還識大體，力排眾議的請仁宗免元孫一死。仁宗心內明白，是他們隱瞞事實在先，現時即使殺了石元孫，也於事無補，反招夏人笑話，結果准賈昌朝之奏。當然，石元孫當日之恤典，全數奪回，而石元孫所有官爵，都被削奪，本人則被編管於全州。翌年二月，石元孫以恩赦，得以量移內地的襄州；但侍御史劉湜(?-1058後)不肯放過他，上奏反對石元孫依恩例量移。仁宗大概怒氣未息，就接納劉湜之議，仍將石元孫編管全州。雖然石元孫後來終得內徙安州及許州，最後並獲准返京師；但他至死都被監管，不得復職。⁶¹

[上接頁124]

10-11；晁說之(1059-1129)：《景迂生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七，頁21；韓維(1017-1098)：《南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十九〈富文忠公墓誌銘〉，頁11-13；宋祁：《景文集》，卷二十〈送承制劉兼濟知原州〉，頁1。又據司馬光所載，黃德和遁歸延州後，爲了掩飾自己臨陣逃走之罪，就串同蕃漢將校張政(?-1040)、呂密(?-1040)及親吏戚睿(?-1040)，作奏狀誣劉平降敵，正好劉的僕夫王信逃來延州，就被黃德和迫他共誣主人降敵，但他後來良心發現，使人致書劉平子(可能是有分從征而逃脫的劉宜孫)，力證劉平未有降敵；後來這書輾轉奏上朝廷，成爲證明劉平無罪的有力證據，但王信最後仍被杖殺。參見《涑水記聞》，卷十一，頁243-246。

- ❶ 例如在慶曆三年知制誥宋祁上書言三路邊防事時，仍然說「劉平、石元孫輕脫寡謀，徑與敵鬥，師敗身死，損辱國威」，不信二人當時並未戰死。參見《景文集》，卷二十八〈言三路邊防七事〉，頁4；《長編》，卷一百二十六，頁2967, 2986；《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503；《涑水記聞》，卷四，頁79；卷十二，頁240；《東軒筆錄》，卷九，頁105-6。
- ❷ 王平爲石元孫說情，他指出「西戎比年犯塞，將校覆歿幾何，甫歸元孫，隨而見戮，是堅降者之志，而絕內顧之望，非計之便。」據宋祁說，王平這番話很有說服力，故石得不誅。不過，當石元孫獲釋後，言官們好像侍御史梅摯(995-1059)便兩度上章，奏論石元孫「不死行陣，係縲以還，國之辱也，不斬無以厲邊臣」。幸而仁宗聽從賈昌朝之意見，奏入不報。至於石元孫從全州獲內徙安州之年月不詳，有趣的是，當年罵過他的大文士宋祁，卻在他內徙安州時代撰一道逾千言的謝表。石元孫後再徙許州，最後獲准返京師而卒，得年七十二。參

[下轉頁126]

劉平「罵賊不食而死」的謊言，因石元孫之歸來而被揭穿。不過，劉平並未生入漢關（劉平在石元孫獲釋前便客死異鄉），他在興慶府苟活的事，宋廷就當作謠言，既不承認，也不公然否認，讓事情慢慢被人遺忘。爲了維持宋廷及劉平的顏面，劉平仍然被視作爲國捐軀之忠臣，他的子弟仍然享受著他的恤典，仍然受到任用，雖然不算特別受到重用。⁶² 劉平的情況，與夏守贇爲他辯護時所提到的康保裔(?-1000後)，有著微妙的

[上接頁125]

見《長編》，卷一百五十五，頁3771；卷一百五十八，頁3820-21；《隆平集》，卷十九，頁724；《宋史》，卷二百五十，頁8815；卷二百九十八〈梅摯傳〉，頁9901-2；《景文集》，卷三十七〈宋故奉直郎守侍御史王公墓誌銘〉，頁1-3；卷四十〈代石太尉謝令安州照管表〉，頁4-7。

⁶² 宋廷大臣在石元孫歸來後，對於三川口之役劉、石二人的生死問題，自然不能再瞎著眼說謊，好像范仲淹在慶曆六年爲范雍寫墓誌銘時，寫到三川口一段，便只好含糊的說「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沒」。既不說劉平偷生，也不說他戰死。參見杜大珪(?-1194後)：《名臣碑傳琬琰集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范忠獻公雍墓誌銘〉（范仲淹撰），頁4。至於劉平子弟之仕宦情況，考劉平弟劉兼濟後來歷知西北重鎮，並一再立功，在皇祐四年官至西上閣門使、惠州刺史，勾管三班院。劉平兒子中，長子劉慶孫(?-1051後)在皇祐三年時官國子博士。次子劉貽孫(?-1048後)在慶曆四年任禮賓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知廣信軍，慶曆七年官至西上閣門副使、荆湖南路兵馬都監；不過，卻以輒託疾尋醫，給本路安撫使彈劾，而責授安遠軍行軍司馬，岳州安置。後來復起，在皇祐元年給權三司使葉清臣許爲「材武剛斷」之將，皇祐五年前後，官至西上閣門使。三子劉宜孫(?-1063後)在仁宗晚年官至西京左藏庫副使。四子劉昌孫(?-1069後)是曾任馬軍副都指揮使、集慶軍節度使張茂實(997-1063)之婿，他在仁宗末年任供備庫副使，神宗初年以文思副使改左驍衛將軍致仕。五子劉孝孫(?-1085後)在慶曆五年以供奉官充淮南撥發，嘉祐元年(1056)曾以供備庫副使出使遼國。到元豐八年(1085)底，僅仕至西京左藏庫副使。他曾以應奉神宗山陵受賞，但以後之仕途並不顯。六子劉保孫仕歷則不詳。至於幼子劉季孫(1033-1092)在哲宗時官至文思副使，在仁宗之世大概尚未出任。另外，劉平之外甥陳安仁(?-1081後)也以劉平之蔭補太廟齋郎，至神宗晚年官至朝請大夫，權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參見《宋史》，卷三百二十五，頁10504；《長編》，卷一百四十九，頁3608；卷一百五十一，頁3676，3707；卷一百五十三，頁3727；卷一百六十，頁3859；卷一百六十六，頁3990；卷一百七十二，頁4133；卷一百八十三，頁4438；卷三百六十二，頁8671；《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五之一〉、〈食貨四五之二〉；司馬光(著)、王根林(點校)：《司馬光奏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卷一〈論劉平招魂葬狀〉，頁5；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三百五十一〈乞賻贈劉季孫狀〉，頁988-89；鄭獬(1022-1072)：《助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宜孫服除可舊官制〉，頁7；卷二十〈贈太尉勤惠張公墓誌銘〉，頁8；蘇頌(1020-1101)(著)、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三十二〈文思副使劉昌孫可左驍衛將軍致仕〉，頁466；范純仁(1027-1101)：《范忠宣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四〈朝請大夫陳公墓誌銘〉，頁8-9；王珪(1019-1085)：《華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十〈西上閣門使劉貽孫等加勳邑制〉，頁40。

雷同。考康保裔是真宗初年的禁軍大將，於咸平三年(1000)以馬軍都虞候、高陽關副都部署率軍與遼軍血戰於河間，因援絕而陷沒於遼。宋廷初時以爲他降敵，後來「證明」他戰死，因此恩恤其家。其實康沒有戰死，他被俘後降於遼。有宋史學者以爲宋朝不知他未死，而爲他舉行追悼活動，並將他的事跡寫入國史忠義傳。我以為宋廷其實後來也知道康未有戰死，只是已爲康發喪，恤典也頒下，只好將錯就錯，當康真的戰死，以保存顏面。夏守贊引用康保裔之前例，其實是間接地透露了康保裔當年沒有戰死的不宣之秘。⁶³ 後來宋廷對劉平生死傳聞之處理手法，我以為正是沿用康之前例，能遮掩就遮掩，可彌縫就彌縫，但求保存宋廷的顏面。

對劉平及石元孫這兩員敗軍之將的處置，宋廷士大夫後來採用如此的雙重標準，我以為主要是爲了虛假的顏面和尊嚴，特別是儒將之尊嚴。劉平是仁宗金口稱許的「詩書之將」，不比尋常武將。在文臣眼中，儒將應有較高的道德要求。儒將可以戰敗，卻不可以成爲楚囚，恥辱地苟活。劉平幸而(也是不幸)沒有生還漢關，不然，他的遭遇只怕會比石元孫更慘。

宋廷刻意掩飾的神話，先在石元孫歸來時招人物議，好不容易掩蓋了；然而又在皇祐三年(1051)六月被劉平的長子、國子博士劉慶孫(?-1051後)糊塗地翻出來，並大大惹惱了以董狐直筆自許之史臣司馬光。這年六月，劉慶孫上書宋廷，請求爲亡父虛造棺槨，招魂假葬。同知禮院兼史館檢討司馬光在八月覆議，強烈反對劉慶孫所請，他在奏

⁶³ 《長編》，卷四十六，頁985-86；《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康保裔傳〉，頁13150-52；脫脫：《遼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卷十四〈聖宗紀五〉，頁155-56；《全宋文》，冊4，卷一百六十二，頁669；向夏(編)：《遼代石刻文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馮從順墓誌〉，頁169-71。按康保裔是曾做過劉平上司的馬軍都虞候康繼英之父。據《遼史》所記，他在瀛州被俘後降遼，遼任他爲昭順軍節度使。而據本世紀在遼寧朝陽縣出土的〈馮從順墓誌〉所載，康保裔與馮從順(967-1023)均因兵潰而被擒，並沒有戰死(按：是條資料蒙同門曾瑞龍兄賜告)。真宗時曾出使遼國的史官路振(975-1014)，在其〈祭戰馬文〉中，也只是說「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並沒有說康戰死，我以為早在真宗朝，宋廷便知道康保裔並沒有戰死。在此附帶一談，《東都事略》和《宋史》的作者，對康保裔傳和劉平傳，處置大相逕庭，實教人不解。考成書在南宋的《事略》只將康傳編入普通的列傳，而將劉平列入〈忠義傳〉首篇；成於元末的《宋史》則將康傳列爲〈忠義傳〉之首，而只將劉平編入普通之列傳。二書作者取捨之標準是甚麼？我懷疑王稱編次《事略》時，實在已曉得康保裔其實沒有戰死，且後來降遼，故不願像宋國史一樣，將他列入忠義傳。對於劉平，一方面可能不確定他偷生夏地之說法是否孰實，另一方面也大概受當時士大夫之影響，有意保存劉平之忠義形像，故將之寫入忠義傳。《宋史》方面，大概撰寫康傳的人，照抄宋之國史，未作考究，因而將康傳編入忠義傳；而由於撰寫劉平傳的人，曾記下他並非戰死，而實卒於興州之說法，加上元人已沒有爲劉平這類儒將「賢者」隱諱之時代需要，故此實事求是，將他編入普通的列傳。關於宋史學者對康保裔出處的討論，最近期的研究可參閱汪聖鐸：《宋真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頁47。汪氏認爲宋廷不知康保裔未死。

中明確地說「今劉平沒身虜廷，喪柩不返」。他認為「非身無棺，非棺無槨，苟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為愆義，於禮為不物」。⁶⁴ 司馬光對父親及岳父的同年劉平一家如此不留情面，雖說他一向道德感強烈兼極重禮法原則，但我以為這亦是他對宋廷隱諱史實的一種間接抗議。考司馬光在是年七月兼任史館檢討後，大概因劉慶孫之上奏，他職務上要提出覆議，就去翻查官方有關記載。他發覺《時政記》和《起居注》都沒有記載康定元年元昊叛宋及慶曆元年遼國遣使索取關南地之事。這時正好龐籍監修國史，司馬光就請求往樞密院追尋兩事本末。當他看完樞密院之檔案而再往史館，希望在國史中補上這二事時，他的上司、史館修撰孫抃(996-1064)卻申明宋廷的立場：「國惡不可書。」司馬光辛苦一場，也只得放棄不寫。司馬光碰了這個大釘子後，很可能就把這一口不平氣發泄在對劉慶孫之覆議上。另外，司馬光先後在嘉祐八年(1063)和熙寧四年(1071)三月為龐籍及張存撰寫墓誌銘時，對當年龐籍和張存為劉平辨冤的事，均隻字不提，似乎是對宋廷隱諱事實的一種消極抗議。⁶⁵ 多年後他將三川口之役始末，極詳盡地寫在他的私家筆記《涑水記聞》上，並在進呈神宗的《稽古錄》的有關條目下，只書元昊「大敗官軍於三川口，執劉平、石元孫」，卻不肯依從官方的說法，說劉平忠義而死。大概也是對宋廷不許他在國史直書「國惡」的一種反應。⁶⁶

司馬光的覆奏雖然把「劉平罵賊不食而死」的假話戳穿，但宋廷對外面不知情的臣民，仍盡可能掩飾。當年有分替劉平申辯的大臣如韓琦和富弼，當撰文提及三川口之役時，也一筆帶過，避談劉平的生死。⁶⁷ 至於曾為石元孫寫過安州編管謝表的宋祁，仍

⁶⁴ 《司馬光奏議》，卷一，頁5。

⁶⁵ 考司馬光在皇祐四年八年為其同年李絢(1013-1052)撰寫墓誌銘時，只說「會夏虜寇西鄙，劉平、石元孫戰沒」。按：戰沒當解作陷沒，不等於戰歿。到他為龐籍及張存寫墓誌銘時，更不再說劉、石戰死的話。另外，司馬光在英宗治平元年(1064)十一月上奏論邊事，提到元昊侵宋之舊事時，他只簡單的說「劉平、任福、葛懷敏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而不提劉平之生死。見《長編》，卷二百三，頁4919；司馬光：《傳家集》，卷三十四〈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四劄子〉，頁6-8；卷七十六〈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頁1-4；〈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頁15-16；卷七十七〈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頁1-2。

⁶⁶ 司馬光(著)、王亦令(點校)：《稽古錄》(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卷十九，頁732。按在舊本的《涑水記聞》有關記載中，都沒有肯定的說劉平罵賊不食而死；只有在鄧廣銘、張希清所作的輯佚中，有一條輯自《宋朝事實類苑》之記載，稱「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考三川口之役發生在康定元年，不在景祐末年，司馬光不應有此錯誤，疑這條記載是後人所加，不是溫公原文。參見《涑水記聞》，〈涑水記聞附錄一〉，頁333。

⁶⁷ 富弼在皇祐四年(1052)為范仲淹撰寫墓誌銘時，只輕輕的說元昊「悉眾寇延州，大將戰沒」，沒說劉平的生死。韓琦在至和元年(1054)為尹洙寫墓表時，也只說「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而他在同年為高志寧(971-1053)撰寫墓誌銘時，也說「及元昊舉兵寇延州，劉平、石元孫陷於賊」。到嘉祐六年(1061)，他為張亢撰寫墓誌銘時，則仍說「大將劉平、石元孫輕薄其鋒，俱為賊所擒」，不肯提劉的生死。另外王珪在皇祐五年

[下轉頁129]

然稱許劉平為國之柱石的「儒將」。⁶⁸ 宋廷到了嘉祐二年(1057)，還再追贈劉平為太尉，並賜諡「壯愍」。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當政的韓琦還向英宗推許劉平當年所上之禦邊策，請陝西安撫使馮京(1021-1094)與四路帥臣參詳劉平之奏。宋廷的舉動，乃讓劉平忠義的神話得以延續下去。⁶⁹ 一些不知就裏的人，因而仍相信劉平忠義而死。⁷⁰

當越來越多人知道劉平被俘而苟活的事實後，好像蘇舜欽這樣仍舊以劉平血戰陷沒的理由，請求重用他的子弟的文臣，就越來越少。仍稱劉平遇害的記載，就僅有王珪的幾篇墓誌銘。⁷¹ 就連神宗本人，也迴避了劉平是否戰死的問題，只說他「軍敗被執」

[上接頁128]

(1053)奉命為夏竦撰神道碑時，也只說「始朝廷銳意興師，及劉平、葛懷敏以輕賊失軍」，而不明說劉平的下場。參見王珪：《華陽集》，卷四十七〈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頁10；《名臣碑傳琬琰集中》，卷十二〈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富弼撰)，頁5；韓琦：《安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十七〈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頁1-2；〈故衛尉卿致仕高公墓誌銘〉，頁7-9；〈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贈遂州觀察使張公墓誌銘〉，頁15-16。

⁶⁸ 按宋祁在嘉祐初年覆皇城使、知涇州劉几(1008-1088)的信中，仍稱「縣官革五代流弊，擢儒將與武夫參用，自劉平以來，未有赫然為國柱石者」。考劉几兼資文武，在宋祁眼中，也屬典型的儒將。當劉几以母老請恢復文階歸養時，宋祁即致書力勸他打消此意，繼續為朝廷效命，並舉出劉平的儒將典範相勸。宋祁仍然視劉平為儒將典型，然他未必不知劉平沒有戰死之真相。參見《景文集》，卷五十〈回劉皇城書〉，頁12-13；《宋史》，卷二百六十二〈劉几傳〉，頁9075-77。

⁶⁹ 《長編》，卷一百八十六，頁4493；卷二百五，頁4965。按韓琦稱劉平所奏，雖與他及范仲淹的禦邊四策稍異，但仍稱劉平所議的「以得西人山界土地、部族為甚利」。

⁷⁰ 好像活躍於仁宗、神宗之間的吳曾文瑩，在其筆記小說《玉壺清話》(約撰於神宗之世)中，便記載仁宗在慶曆壬午歲好水川之役發生後十餘日，才從一宮中服役的老卒口中及其家書中，曉得劉平及五六大將同時被殺。文瑩又說劉平、任福(981-1041)、葛懷敏(?-1042)等同役遇害，而石元孫則被俘。考文瑩這條筆記在時間及人物方面都有錯，按慶曆壬午歲即慶曆二年(1042)，然好水川一役發生於慶曆元年(1041)，不在二年；另是役陣亡的宋軍大將，除任福外，並不包括劉平和葛懷敏，而石元孫亦非在是役被俘。文瑩顯然將康定元年三川口之役、慶曆元年好水川之役和慶曆二年定川之役混為一談，以為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將均沒於慶曆二年。文瑩所記，多出於道聽塗說，這條筆記所載雖與事實有出入，但可反證晚至神宗之世，還有不少人以為劉平真的忠義而死。考南宋初曾慥(?-1155)所編的《類說》，所引今已佚、趙辟公撰之《雜說》一書，與文瑩所記相同，不知誰因襲誰。參見《玉壺清話》，卷六，頁62；曾慥(著)、王汝濤等(校注)：《類說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五，頁1633-34。

⁷¹ 蘇舜欽上奏請用劉平、石元孫子弟，是在宋廷誅黃德和而未恩恤劉石二家之時，當時蘇舜欽大概不知二人其實未死，才會上書。在可見之史料中，到了英宗(1063-1067在位)以後，仍稱劉平戰死的，似乎只有那個一向謹小慎微、恪守宋廷意旨的王珪。考王珪在仁宗皇祐五年及英宗治平三年(1066)，先後奉詔為夏竦及宋庠撰神道碑時，均只輕輕一句帶過，說劉平、石

[下轉頁130]

和被誣降敵。⁷² 仍然相信劉平真的罵賊不食而死，並以此理由請求重用劉平子弟的文臣，似乎蘇軾(1036-1101)是最後一個。當然，我們不能肯定蘇軾確是不知真相，還是為了與劉平幼子劉季孫多年交情，而裝做不知。蘇軾首先在哲宗(1085-1100在位)元祐元年(1086)六月為富弼撰寫神道碑時，仍稱劉平、石元孫戰死，並說劉平乃「罵賊不食而死」。⁷³ 繼而在元祐五年(1090)，即劉平兵敗被俘後五十年，在杭州上奏，大力推薦當時在他屬下的浙西兵馬都監劉季孫。蘇軾仍然說劉平當年以孤軍援延州，因姦臣不救，而致戰沒，最後更「罵賊不食而死」。他說劉平有數子，皆才用過人，不過除了現年已五十八的劉季孫外，都已過世。他推許劉季孫「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況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在蘇軾筆下，劉季孫簡直是儒將劉平的翻版。蘇軾力請宋廷擢用他，置於邊庭要害之地，他認為這樣做，「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⁷⁴

看在蘇軾的面上，宋廷給劉季孫一個知州的差使，委他出知西邊的隰州，稍後再遷一官為文思副使。不過劉季孫尚未得到怎樣重用前，便在元祐七年(1092)五月卒於官，得年六十。出於交情及同情，蘇軾再度上奏，重提劉平的忠義死事和劉季孫的文才武略，並及劉氏身後蕭條之境況，希望宋廷優給賻贈。蘇軾甚至近於抱不平的說劉平「以

[上接頁129]

元孫及葛懷敏以輕賊失軍，而不言其生死。惟在治平元年(1064)和熙寧元年(1068)，當他奉詔為龐籍寫神道碑和替賈昌朝寫墓誌銘時，則稱劉平戰死。其他名臣便不肯撒謊，好像在治平二年(1065)，當王安石(1021-1086)替賈昌朝撰寫神道碑時，便記劉平並未戰死，而實為元昊所獲，另又載石元孫獲釋之事。范鎮(1008-1089)在同年為范雍撰寫神道碑時，也和王安石一樣，不肯再撒謊。另外比《玉壺清話》成書稍晚，約撰於神宗、哲宗之世的《澠水燕談錄》，亦記劉平其實被俘未死(按：王闢之在同書同卷卻又稱「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此條記載與《澠水記聞》所記文字完全相同，因襲關係待考)。參見注66；及《華陽集》，卷四十七〈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頁10；卷四十八〈贈司空兼侍中龐公神道碑〉，頁3；〈贈太尉兼侍中宋元憲公神道碑銘〉，頁13；卷五十六〈賈昌朝墓誌銘〉，頁4；王安石(著)、唐武標(校)：《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卷八十三〈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頁887-89；《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六〈范忠獻公雍神道碑〉(范鎮撰)，頁9；《澠水燕談錄》，卷二，頁15-16；《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卷七〈乞用劉子子弟〉，頁488。

⁷² 考神宗於熙寧八年(1075)六月為韓琦撰寫神道碑，言及劉平戰敗被誣時，韓琦力為劉平辨冤。在碑中，神宗隻字不提劉平石元孫「忠勇戰死」。同年八月，李清臣奉神宗命為韓琦撰寫行狀，也只說劉平戰敗，而不說他戰死。參見《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一〈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神宗撰)，頁10；《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八〈韓忠獻公琦行狀〉(李清臣撰)，頁5。

⁷³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五〈富鄭公弼顯忠尚德之碑〉(蘇軾撰)，頁7，19。

⁷⁴ 劉季孫其他生平事跡，參見本文附錄。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忠義死事，聲跡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然而，蘇軾的仗義上言，卻未得到期望的回應。⁷⁵ 宋廷的冷淡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事隔多年，劉平當年有沒有罵賊而死的真相，早已為宋廷所知。為了保存宋廷的顏面，故此官方仍公開地說劉平殉國而死，而沒有像對石元孫那樣，取消他所有恤典恩賞。站在宋廷立場，這樣處理，對敗軍之將的劉平及其家人來說，已是情至義盡。要宋廷再為劉平的「忠義」樣板而對劉季孫額外加恩，實是苛求。蘇軾本來應該看得出，當劉家弄到後嗣「卒無顯者，家事狼狽，賜第易主」，而宋廷卻不肯加以存恤時，劉平的神話早已破滅，再沒有甚麼利用價值。當日不是他極力保薦，只怕劉季孫最後連一分知州的差遣都拿不到。至於東坡說劉季孫「忠義勇烈，識者以為有〔劉〕平之風」，恐怕只會弄巧反拙，幫了倒忙。

曾鞏和王稱分別編撰《隆平集》和《東都事略》的時候，仍採用宋官方的觀點，把劉平、劉季孫父子寫成忠義過人的儒將，至於劉平敗軍而苟活之事實，就諱莫如深。⁷⁶ 一些撰於北宋末、南宋初而疏於考究的奏議及筆記小說，於是因襲成說，仍稱劉平敗死沙場；⁷⁷ 即使撰於南宋中晚期之半官方史書，以參照羣書而博考詳訂著稱的《九朝編

⁷⁵ 《蘇軾文集》，卷三百五十一〈乞賻贈劉季孫狀〉，頁988-89。《東都事略》，卷一百一十〈劉季孫傳〉，頁1686-87。考羣書均未載蘇軾上奏後，宋廷有何表示，連《東都事略·劉季孫傳》都沒說宋廷有何恩恤。據《東都事略》之說法，劉季孫卒於隰州任上，惟一則南宋人筆記卻說劉季孫在知忻州任上卒，又稱他預知死期。參見趙與時(1175-1231)(著)、齊治平(校點)：《賓退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六，頁78。

⁷⁶ 曾鞏在編寫《隆平集》時，在多處地方，仍稱劉平戰歿。參見《隆平集》，卷十五〈尹洙傳〉，頁4；卷十九〈石元孫傳〉，頁6-8。又宋朝官方在徽宗崇寧間撰寫文彥博傳時，仍然重覆劉平、石元孫被執，黃德和先遁卻誣陷劉平石元孫降敵的官方說法，只差沒說劉平不食而死的謊言。參見《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三〈文忠烈公彥博傳〉(實錄)，頁1。

⁷⁷ 好像在靖康元年(1126)九月，中書舍人安扶(?-1126後)在劾奏李綱(1083-1140)時，引用當年好水川之役的例子，但安扶上奏前，卻不去查清史實，竟以為劉平和任福一樣，陣亡於此役。同年十月再有臣僚上言，又犯了安扶同一錯誤，以為劉平與任福同死於好水川。另蔡京(1047-1126)季子蔡絛(?-1150後)撰於南宋初年之筆記小說，仍稱劉平敗死，不說他偷生；而且為了加重劉平敗亡之厄，又說當時京師出現了雨血。另撰於高宗、孝宗之交的筆記小說《東園叢說》也沿襲舊說，稱「仁宗朝西邊用兵，劉平、任福、葛懷敏等皆破軍殺將」。此外，南宋大名士王十朋(1112-1171)在隆興元年(1163)上奏言事，仍稱劉平力戰而死，而宋廷褒其死節。參見徐夢莘(1126-1207)：《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五十五，頁8；蔡絛(著)、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一，頁4；汪藻(1079-1154)：《靖康要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頁1；李如篋(?-1062後)：《東園叢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下〈以少敗眾〉，頁13；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文集〉，卷四〈乞審核李顯忠等功罪劄子〉，頁632。

年備要》，仍然因襲官方之說，稱劉平戰死。⁷⁸然而，在宋廷頭腦清醒的士大夫心中，劉平儒將的樣板，其實在他死後不到五十年便早已破滅，不必等到元人修《宋史》時，才將他的神話戳穿。

四、餘論

宋代是士大夫當家作主的時代，士大夫們要駕馭成千上萬的武夫悍將，去完成統一大業，並抗擊西北二敵，他們當中非有相當數量通曉軍事的人不可。除了鑽研兵學，議論軍事成爲時尚外，⁷⁹宋代士大夫仿效前代儒將，投筆從戎的風氣亦相當普遍。生存環境(如出生及工作於西北兩邊州郡)、家庭背景(如將家)、個人性向喜好(如喜武技、愛讀兵書)和個人際遇均是培育造就儒將之因素。和行伍出身的武將相比，儒將有利的條件，首先是他們能說會寫，面對軍事外行的文臣同僚，他們講得頭頭是道的策略建議，通常是駁不倒的，他們往往能藉此爭取到更多資源。其次，他們出身文臣，縱使後來轉爲武資；然他們的文官經驗，以及他們背後的文臣關係網，仍然繼續幫助他們在宦海中趨吉避凶。當然，事情總有兩方面，儒將也有明顯的弱點：第一，他們好發議論，容易過了頭而變成紙上談兵，而不知兵凶戰危。第二，儒將來自文臣，而往往他們不可避免的牽入文臣間的黨爭，使政治介入了軍事。第三，人們對儒將通常有較高的要求和期望，尤其在道德操守方面，更要求有較高標準。在盛名之累下，儒將也就承受較大之壓力，而易招批評非議。⁸⁰從劉平的個案，我們或可以一窺宋代儒將產生的背景，以及他們具有的優勢與存在的弱點。

宋代儒將的成與敗，除了主觀的素質條件外，戰場上對手的強弱是關鍵所在。當然，古之名將起碼能知己知彼，好像劉平完全不了解元昊之實力，而貿然出戰，他就絕不是智勇兼備的儒將。誠然，劉平的運氣是有點差的，假若他在三川口碰上的不是元昊，或元昊遲數年始侵宋，或許被仁宗譽爲儒將的劉平可以避過考驗，而得以功名令終。對劉平來說，更不幸的是，他沒有在戰場上陣亡，而去做敵國的楚囚，就大大不符

⁷⁸ 陳均的《九朝編年備要》，不但說劉平戰死，還說石元孫也同時遇難；而在慶曆五年五月條下，陳均並未記石元孫被釋歸宋之事，似乎有意隱諱劉、石不光彩的事。參見《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一，頁1-2；卷十五，頁7。相較之下，李燾子李暉便秉筆直書。他在其《皇宋十朝綱要》，便只說劉、石二人被執，而不言其遇難，並且記錄後來石元孫獲釋之事。另外，葉夢得在其《石林燕語》，亦只說劉、石二人兵敗被執，而沒說他們戰死。參見《皇宋十朝綱要》，卷五，頁10；卷六，頁2；《石林燕語》，卷八，頁120；卷九，頁134。

⁷⁹ 關於宋代儒臣議論軍事，鑽研兵學的問題，最近期的研究，可參閱王瑞明：《宋儒風采》（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第十二章〈宋儒的軍事謀略〉，頁593-640。

⁸⁰ 好像神宗朝開河湟有大功的儒將王韶(1031-1081)，便因私德有虧以及殺降之故，受到宋人嚴厲的批評，指他後來「病疽發背，洞見五臟，亦其報也」。同樣劉平後來不能以死殉國，自然不爲士大夫所諒。參見《長編》，卷三百一十三，頁7952。

儒將所講求的氣節。宋廷爲了顧全顏面，被迫製造他「罵賊不食而死」的謊話，乃教宋代儒將的神話蒙上一大層陰影。⁸¹

北宋具有將略的文臣晉身二府，特別是樞密院的爲數不少；但由文臣換武資而陞任三衙管軍，卻只有極少數，甚至是異數。劉平是第一個，而整個北宋，似乎只有种氏將門的第二代种諤(1027-1083)及其姪种師道(1051-1126)和种師中(1059-1126)有此經歷。种家伯姪三人中，以种師道最符合儒將之條件。⁸² 教人惋惜的是，劉平和种師道這兩個稱得上異數的儒將，都是在儒臣看好和吹噓下，在老邁之年碰上平生未遇的大敵，而成爲敗軍之將，喪失了一生的英名。雖然，宋廷士大夫爲了顏面，爲了鼓勵士氣，仍刻意描繪他們忠義及智勇過人的神話。⁸³

⁸¹ 附帶一談，在劉平被俘後四十二年(即元豐五年)，以儒將自命而實在志大才疏的徐禧(?-1082)，在永樂城一役中因瞎指揮而招致全軍覆沒。宋廷以爲他戰死，就給他很厚之恤典，並賜諡「忠愍」；不過，據《邵氏聞見錄》及《長編》所載，宋廷後來知道他像劉平一樣，並沒有戰死，而是苟活下來。參見邵伯溫(1056-1134)(著)、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十，頁102；《長編》，卷三百二十九，頁7937；卷三百三十，頁7955。按：承曾瑞龍兄相告，邵伯溫及李燾此說本張舜民(?-1110)之《畫墁錄》，參見陶宗儀(?-1360)：《說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十八，頁5a。

⁸² 种諤以文資起家，他以國子博士換武資爲左藏庫副使，在神宗朝以軍功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位列管軍。种師道早年從大儒張載(1020-1078)學，以伯父种諤蔭補三班奉職，後試法轉爲文階，當了多年文官，中年才再轉武資。從莊宅使做起，歷守西邊，多次敗夏人立功，在徽宗(1101-1125在位)末年拜管軍。和劉平一樣，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做起，一直做到馬軍副都指揮使並建節。他在宣和四年(1122)領軍征遼失敗後被休致，但宣和七年(1125)底，金兵南侵，他又被徵召，統西兵入衛，在靖康元年(1126)還出任同知樞密院事，晉身二府大臣，然他的謀略不受重用。他在開封城破前病逝，雖不免敗軍之譏，但總算避過楚囚之恥。种師道據稱說話木訥，卻會作詩，《全宋詩》即輯得他詩兩首，說他是儒將，也不爲過。南宋人包括朱熹(1130-1200)在內，對种師道評價甚高，甚至認爲他才兼將相，對他木訥寡言，不以爲短。种師中亦是由文資官轉武職，在西邊一再立功，也有分征遼。他一直做到馬軍副都指揮使及奉寧軍承宣使，在靖康元年亦率軍勤王，後來派往援救太原，戰死於榆次。不過，他當文官的時間不長，而作爲儒將的條件氣質也不及乃兄。他戰死榆次，給人批評因恃勇輕進而敗，而他被諡「壯愍」，正好又與劉平相同。參見《宋史》，卷三百三十五〈种諤傳〉，頁10745-48；〈种師道、种師中傳〉，頁10750-55；韓維：《南陽集》，卷十七〈國子博士种諤可左藏庫副使殿中丞种診可洛苑副使〉，頁5；《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四，頁12；卷四十七，頁7；《全宋詩》，冊18(1995年3月)，卷一千九十二，頁12373-74；《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十六〉、〈禮五八之一零八〉；黎靖德(?-1270後)(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一百三十，頁3132-34；另參拙著：〈論靖康之難中的种師道與种師中〉，載《宋史論文集·羅球慶老師紀念專輯》，頁46-69。

⁸³ 种師道的官位雖比劉平高，但沒有劉平的進士及第資格。和劉平一樣，他之叔伯兄弟以至子姪均爲武臣，另外他也曾被捲入文臣黨爭。參見拙著：〈論靖康之難中的种師道與种師中〉。

宋代儒將可以談論的地方還很多，我們固然可從失敗的儒將如劉平的經歷，知道宋代儒將的不易為；在另一方面，我們亦可從成功的儒將，好像神宗時的王韶(1031-1081)、南宋初的虞允文(1110-1174)等的經歷，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從而豐富我們對宋代儒將的認識。

附錄：劉季孫事跡考

劉季孫字景文，是劉平幼子，《宋史》無傳；惟《東都事略》卻有傳，附於乃父傳後。他是仁宗朝名臣、官至知樞密院事的盛度(968-1041)的女婿。劉季孫雖然出身名門，得享恩蔭出身；但據與他交好的強至(1022-1076)所說，這反而使他不能應舉，只能出任武職。他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其後歷任閩州兵馬監押、權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最後官至文思副使，在知隰州任上卒。

他雖是將家子，卻工詩善文，據說早年以能賦稱大學。《全宋詩》即錄得劉季孫詩一卷凡三十三首。他與蘇軾交情甚深，常是東坡的座上客，二人並常詩酒唱和。在二人的詩集中，屢見互贈的詩賦。他又做過東坡的下屬，無怪東坡在公在私都如此竭力地舉薦他。他與東坡門人黃庭堅(1045-1105)、秦觀、晁補之和張耒(1054-1114)都交好。在四人的詩集中，即有贈劉的詩多首，既稱許劉之文才武略，又盛譽劉門之忠勇，例如黃庭堅在〈和劉景文〉一詩中，即說「劉侯本將家，今為讀書客。詩名二十年，風雅自推激」；而秦觀在〈贈劉使君景文〉一詩中，則稱許他「落落衣冠八尺雄，魚符新賜大河東。穰苴兵法申司馬，曹植詩原出國風」，又張耒在〈送劉季孫赴浙東〉一詩中，稱劉季孫是「堂堂山西忠勇後，凜凜典刑在眉目」，另在〈送劉季孫守隰州〉一詩裏，又譽他「君家將軍本縫掖，叱咤西摧賀蘭石。一時成敗何足論，要使英名垂竹帛」。對劉平父子既推崇又寄以同情。除蘇軾師弟及強至外，劉季孫和當時的僧俗朝臣名士多有往還，包括蘇軾至交、駙馬都尉王詵(1048-1104後)、詩僧道潛(1043-1116)、朝臣名士彭汝礪(1042-1095)、楊傑(?-1090後)、李復(?-1095後)和米芾(1051-1107)等人。據宋人筆記載，王安石擔任江南東路提刑按察使時，曾出巡至饒州，看到劉季孫題在治所壁上的小詩，大加稱賞之餘，一度命劉權本州教授。後來王安石當國，有否提拔劉季孫，就不可考了。

除了長於賦詩外，劉季孫還是書畫的收藏家和鑑賞家，他往往不惜千金搜購名帖名畫。據宋人筆記所載，他歿於隰州時，家無一錢，卻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據米芾所記，他兒子在他死後，就只好將他的珍藏變賣，換錢餬口。

宋人對他之不得志，多寄予同情。宋人筆記甚至用荒誕不經的傳說，去惋惜他之懷才不遇。據《春渚紀聞》所載，劉季孫晚年常夢見與晉文公(?-前628)神交，且與文公在夢中多有酬唱，並且記錄下來，編成小集，藏於家中。當他到隰州上任後三日，即往謁在東城的晉文公神祠。據說他出東城所經之地及拜瞻神祠所見，居然與他在夢中與晉文公同遊所見相恍。關於劉季孫之死，《春渚紀聞》又附會與文公有關，稱有一日劉季孫得夢，說天帝有旨，以他代替晉文公的位置。過了月餘，劉季孫果然得疾。有宿於城

郊的人後來說，忽然見到劉季孫帶同侍衛嚴整地進入晉文公祠，到第二天往太守府查問，才知劉季孫已於一天前病卒了。⁸⁴

1997年11月21日初稿

1998年12月16日二稿

⁸⁴ 參見《蘇軾文集》，卷三十一〈乞擢用劉季孫狀〉，頁900-901；莊綽(?-1150後)(著)、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下，頁103-4；黃庭堅：《山谷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次韻劉景文登鄴王臺見思五首〉，頁5；卷二十六〈書劉景文詩後〉，頁7；《山谷外集》，卷四〈和劉景文〉，頁21；〈奉謝劉景文送團茶〉、〈謝景文惠浩然所作廷珪墨〉，頁24；卷六〈同劉景文遊郭氏西園因留宿〉，頁15；〈同景文文詠蓮塘〉，頁26；《全宋詩》，冊12(1993年9月)，卷七百二十三，頁8364-72；《淮海集》，卷九〈贈劉使君景文〉，頁6；張耒(著)、李逸安等(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十四〈送劉季孫守隰州〉，頁244；卷十五〈送劉季孫赴浙東〉，頁258；晁補之(1053-1110)：《雞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二〈過劉季孫〉，頁3；卷十五〈答劉季孫〉，頁4；道潛：《參寥子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病中四絕句呈劉景文左藏〉，頁8；〈景文寵示四月十七日翰林公過龍山真覺院〉、〈夏夜懷景文路分〉、〈次韻景文會朱克仁大夫〉，頁12；卷七〈送景文〉，頁1；彭汝礪：《鄱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次韻劉景文見寄〉，頁20；楊傑：《無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和劉景文路分成考〉，頁7；李復：《澗水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回知隰州劉季孫左藏書〉，頁17；米芾：《寶晉英公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劉季孫跋題〉，頁7；米芾：《書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獻之送梨帖〉，頁7-8；張世南(?-1264後)(著)、張茂鵬(點校)：《遊宦紀聞》(與《舊聞證誤》合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九，頁76；強至：《祠部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依韻和酬閬州劉侍禁季孫見寄〉，頁16；周輝(1124-1195後)(著)、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八〈芝山詩〉，頁336-37；何蓮(1077-1145)：《春渚紀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劉景文夢代晉文公〉，頁3。

Liu Ping (973–after 1040): A Defeated Scholar-General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Summary)

Koon-wan Ho

This paper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Liu Ping 劉平, a Confucian scholar-general (儒將) in Northern Song 北宋 dynasty.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a study of his career, we may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to his rise to power, and Song scholars' perception of Confucian scholar-generals in their time.

Liu Ping attracted attention among scholar-generals in Song history mainly because of his defeat in the Battle of Sanchuan Pass 三川口. However, his career in the military is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Being the son of a middle-rank military officer, Liu Ping gave up his chance to become a junior military officer through the *yin* 蔭 privilege, but chose to compete for a civilian post through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He obtained his *jinsshi* 進士 degree in 1005, and during the next nineteen years, he served as a civilian officer in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is expertise in military affairs greatly impressed the Emperor. As a result, in 1203, he was promoted from Attendant Cenor (侍御史) to a military official of middle-rank. In the sixteen years that followed, he was promoted several times, and finally in 1039, he became Deputy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Metropolitan Infantry Command (步軍副都指揮使), the third senior rank in the Imperial Army. He was highly praised by Emperor Renzong 仁宗 (r. 1022–1063), and was recognized by many of his contemporaries as a model officer. In the eyes of his admirers, he was loyal, courageous, and intelligent.

In early 1040, Liu Ping led an army of nine thousand to relieve Yanzhou 延州 from the Xi Xia 西夏 invasion. Unfortunately, his underestimation of Yuan Hao 元昊 (r. 1032–1048), the leader of Xi Xia, led to the shameful defeat in the Battle of Sanchuan Pass. He was captured by Yuan Hao and was imprisoned in Xingqing Fu 興慶府, where he died few years later.

Shortly after the battle, Liu and his deputy Shi Yuansun 石元孫 (?–after 1046) were accused by the eunuch inspector that they had in fact surrendered to their enemy by choice. The Emperor was infuriated and gave order to arrest Liu's and Shi's families immediately. Nevertheless, most of the civilian officials at the court stood up for him. A special commission was set up with imperial approval to conduct an inquiry. Since Liu was overwhelmingly supported by his friends, the report released by the commission was favourable to him. Accordingly, the Court believed that Liu and Shi had fought against the enemy and died in the battlefield, which was an act of great bravery. It was recommended that they be granted posthumous titles and their families given promotions.

However, contrary to all expectations of the Court members, Shi was released by the enemy in 1045, after Song concluded a peace treaty with Xi Xia early that year. His return

was indeed an embarrassment. The Court had to admit that the rumour about Liu's surrender was not unfounded, but decided that the truth must not be revealed because the reputation of the country had to be guarded. A Confucian scholar-general can be defeated, but he must not throw himself to his enemy's mercy in order to survive.

Except for Sima Guang 司馬光 (1019–1086), the Court's decision was not challenged ever since. It never withheld Liu's posthumous title. However, Liu ceased to be a model Confucian scholar-general shortly after his death.

